



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公益项目

Public service project of Beijing Gender Health Education Institute

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2006)年会
暨《中国男男性交易状态调查》、
《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研讨会 特刊

分享与交流

SHARING AND COMMUNICATING

(内部交流资料 请勿擅自转载)

Interior communicative references and reprinting is forbidden without authorization

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2006)年会
暨《中国男男性交易状态调查》、
《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研讨会

讨论纪要

2007年3月31日 北京

发言纪要

郭雅琦（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理事、艾协志愿者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主任、心理咨询师）：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2006年年会暨两个研究报告的研讨会，因为我们是一个民间草根组织，所以我们的会议非常简化，为了能够使更多的专家和领导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我的工作介绍就会简单一些。我们的具体工作，在我们布置的汇报展台上都有介绍。

先介绍一下今天到会的嘉宾：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戴志澄教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高燕宁教授，中国社科院的人类学家翁乃群教授，清华大学的法学家李楯教授，UNAIDS的何景琳博士，世界卫生组织的赵鹏飞博士，安徽医科大学的张洪波教授，中国CDC性艾中心国际合作部刘惠副主任，爱知行咨询中心万延海所长，全球基金五轮项目办的蒋宁先生。

在学术方面给我们极大支持的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正在走进会场。

这边在座的嘉宾还有：著名的心理学家金德初教授，中国性学会官方网站的主编李扁先生。今天给我们做同传翻译的是著名流行病学专家、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张孔来教授。

我还要郑重介绍项目的支持机构——福特基金会的几位成员，有李文晶博士，还有福特总部的sine（音）女士。

还有今天我们会议的两位主角，就是纪安德咨询中心聘请的著名学者、作家童戈先生和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郭晓飞博士。

我首先简单汇报一下纪安德的情况。

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是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于2002年7月份在工商局注册成立，原名是北京纪安德健康教育研究所，2005年根据政府的相关规定，更名为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

纪安德成立短短的5年来，在各方面支持和帮助下，取得了持续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2005年，纪安德在及其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努力，



转变思想，调整方向，终于走出困境，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有一个公益项目——北京 99575 同志健康热线，今年正好是这个热线成立 10 周年，在这里我先简单回顾一下北京同志热线。

北京同志热线是 1997 年 3 月 29 日开通的。在开通之前，北京的一些关注同志问题的人，包括男、女同性恋者，他们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就开始在艾滋病干预和人权支持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努力。那时候，基本是在比较小的范围内，通过个人的关系开展工作。他们接触了国外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观念、先进思想，也得到了一些艾滋病危害等信息，他们就团结和发动身边的同志人士，在当时非常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冒着被抓捕、被开除公职的风险，启动了同志人群争取平等社会权益、抵制艾滋病危害的民间工作。他们不断的团结、吸引更多的同志人士，尤其是一些有着文化、教育、媒体、官方机构职业背景的人士，在毫无支持条件下，有时几个人，有时 20 多个人，躲在一方斗室中，为一些国内的同志问题进行认真而激烈的讨论，有时候辩论不休，通宵达旦。

这些工作为 1997 年建立北京同志热线奠定了基础。1997 年 3 月 29 号，北京的十余名国内外女 / 男同志决定自己出资建立这个热线。当时还是用所谓比较先进的 BP 机来进行咨询工作，因为这种形式相对比较安全。

北京同志热线成立以后，为国内同志人群的发动，做了非常大量的工作。2000 年，在马丁先生及马丁基金会的支持下，热线获得了一些资助，扩大了工作。热线积极参与了宣传、培训、艾滋病外展工作以及一些研究工作。2002 年，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成立以后，北京同志热线就成为这个咨询中心的一个公益项目，而且咨询者的咨询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热线的职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今年是北京同志热线成立 10 周年，我们去寻找建立这个热线的那些创始人时，发现他们大部分都已经去了国外。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 2006 年的一些工作。

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从 2002 年成立以来，一直在探索着自己的角色和位置，在艰难的探索中，到了 2006 年，我们主要在几个重点领域里开展工作。

●在 MSM 人群中开展艾滋病宣传和行为干预以及开展相关的研究、倡导、技术支持的工作。在艾滋病工作领域，尤其是在 MSM 人群的艾滋病干预工作领域里，纪安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03 年我们在国际艾滋病联盟的支持下，把参与式的培训本土化，设计出了可以推广应用的培训方案，很快就开始普遍推广，目前，在各

地、各个部门举办的很多培训活动，都采用这种参与式的方式进行。

2004年，我们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努力向参与学术研究的方向调整。这几年，我们在中英项目、WHO和UNAIDS的支持下，我们聘请童戈先生主持，完成了反响强烈的《MSM人群预防艾滋病行为干预方法研究》。并且，还相继完成了《同志社区艾滋病干预经验汇编》、《MSM人群艾滋病干预实施指南》、《中国MSM人群艾滋病干预工作回顾》、《MSM人群社区VCT模式的探索》等多种成果。

同时我们还协助中英项目和国家CDC完成了《艾滋病防治工具书——MSM人群分册》，这也是由童戈先生主编的。

2006年，国家加大了在MSM人群中开展艾滋病干预的力度，一年来，我们除了参予国家CDC、中国艾协、各地CDC，以及其它组织针对CDC人员的培训，以及志愿者的培训。我们还参与WHO的有关MSM人群相关项目的技术支持。目前，我们正在WHO的支持下，组织专家组，完成一个《MSM人群预防艾滋病行为干预实施指南》的研究和编写工作。

●在性学研究领域，努力进行新的探索和突破。2004年开始，在福特基金会李文晶博士的建议和支持下，我们开始涉足性学领域。同时，我们在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及其学生的支持和参与下，聘请童戈先生主持，进行中国男男“性”问题的研究。

2005年，童戈先生支持完成了《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报告，今年，他又主持完成了《中国男男性交易状态调查》报告。这两部著作都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性学领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今天的会议，还有一个主题，就是研讨童戈先生的《中国男男性交易状态调查》。

另外，我们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非常高兴可以协助郭晓飞博士正式出版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这部论著的完成和出版，在中国的法学研究方面，也是在同性恋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介绍和讨论这部论著，也是我们这个会议的一个主题。

●在纪安德成立之初，我们就尝试将同性恋问题的研究纳入到性别研究，社会性别的研究领域中。但主流的性别研究还是比较集中于男女两性的研究，和同性的社会性别认识比较脱节，所以，我们一直没有介入到主流的社会性别研究领域中去。2006年，也是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在李文晶博士的推荐下，我们参加了一些关于社会性别方面的学术会议。



在会上，介绍了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并以我们的理解，把同性活动中的一些表现作为社会性别的案例、问题，进行了理论的分析，获得了与会专家的好评和重视，使我们能够在社会性别领域里有了一个的突破，这也是我们今后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心理健康服务工作。2006年，我们在北京同志热线的基础上，把热线咨询服务从单纯的社区支持、心理支持尝试着向心理健康服务专业化、多样化的方向转化，也取得了一些初步的经验。目前，我们也努力在心理咨询师领域里积极开展一些培训和宣传工作，希望让更多的心理咨询师能够在同性恋问题上走出传统的病理化认识的影响，利用心理学的专业技术，为在性倾向方面有需求的一些人提供非病理化、非歧视性的心理健康服务。

●信息平台的建立。前几年，我们的工作基本都处于比较低调的状态，我们形成的成果，也没有渠道能够更多的宣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完善了我们的中文网站，同时建立了我们的英文网站。我们还筹办了《性别与健康》的中英文版的刊物，目前中文版已经出版了四期，英文版也出版了一期，所有这些都属于我们刚刚起步，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去解决。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从长远出发，将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的工作宗旨调整为“关注性与健康、接纳性的多元性、减少歧视与不公，促进社会和谐”。

我们今后还将在学术方面，尤其是在和青年研究者的交流方面，可能会做更多的工作。这一点我们也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有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潘绥铭教授的支持，我们在性社会学研究所的名下，成立了一个性与健康研究中心。我们计划以这个中心的名义更多地去帮助那些愿意参与这个领域工作的青年人开展一些研究工作。

我的总结就讲这些，更多的信息，在我们布置的展板上详细介绍。

最后，感谢所有支持和帮助过我们的组织、机构和专家，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今后的工作中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谢谢大家。

下面进入本次会议的主题，《中国男男性交易状态调查》和《中国视野下的同性恋》的研讨，这两个项目是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完成的，先请资助方的李文晶博士讲话。

李文晶博士：大家早。首先，我非常高兴代表福特基金会来参加

这个会议，这次除了我和我的两位助理以外，还有远道从纽约来的我的领导萨拉，我很高兴她来参加。我非常感谢主办单位，因为我们提前到了一个星期，希望没有造成你们太多的不便。

中国在同性恋方面的项目以及对同性恋的关注，虽然早在80年代、9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在对同性恋的种种文化、社会和心理、生理方面，尤其是他的性认同、性行为、性权益研究方面，确实是在近几年才慢慢开始，尤其是在90年代后期，中国意识到艾滋病的严峻，尤其意识到经过性行为将会将艾滋病广泛传播，所以大量的注意力才转移到对同性恋群体的注意。但大量项目脱离不了传统的方式，比如提倡使用安全套，提倡安全性行为，甚至有的项目是要改变同性恋的性行为。所以，很多地方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大家不太了解同性恋的生存状况和他们的需求情况。

尤其是，我们对同性恋群体的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工作状况和社会状况、心理和生理状况，甚至，刚才我也提到，连他们最基本生存状况的记载都非常少，基本可以说没有。中国虽然开放了20多年，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开放了很多，但对于性别的多样化和选择的自由度仍处在比较保守的状态下，同性恋群体的声音和需求也发不出来，所以导致很多针对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项目也无法对症下药，效果不大。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在国内是最早注意到同性恋课题的组织之一，由早期的热线到外展服务到参与国内外的各种研究，到现在自己设计，亲自研究，这是个漫长的路，我要恭喜你们。这些年来，他们的工作帮助了很多的政策决定者、医疗服务者、研究者、一些学者和一般的民众，帮助大家了解这个群体的需求，收集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这是非常难得的。

美中不足的是，这些年来，同性恋的许多工作都是集中在男男的性行为，男男的同性恋，而女同性恋的声音却非常少，这方面有系统记载和研究的资料更是非常少。我提过多次，也希望鼓励纪安德能够把你们的工作扩展到女性同性恋的团体，能够听听她们的声音，也能够召集她们的群体来参加你们的工作。

福特基金会是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基金会，中国办公室是1988年成立的，基金会的宗旨之一是帮助少数及弱勢的群体，同时注重社会性别的多元化，提倡平等和公正。福特基金会很高兴有机会能够支持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这么多年的工作，提供一些资源，同时帮助他们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因此，在此我祝贺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更进步，更上一层楼，预祝会议的成功，谢谢。



郭雅琦：几年来，纪安德咨询中心在性学、社会性别方面的研究离不开学术的坚强后盾，也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潘绥铭教授以及他的那些学生。没有他们，我们的这些工作可能还得徘徊和探索更长时间，这个成果的取得与他们的支持分不开。下面请潘绥铭教授讲话。

潘绥铭：谢谢大家。我们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这几年来与纪安德合作得非常愉快。因为我们研究所本身并没有进行任何对于同性恋的研究，主要都是我们随时来参与他们的活动。从我们学术发展的角度来说，如果缺了这一块，那么，这个学科就是非常不完整的，可以说是难以立足的。可是，我们的成员又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很困难。所以，我们和纪安德合作以后，感觉在学术上的收获非常大。像童戈先生完成的两个调查，写的两本书，至少，对我们这些好象研究性行为很多年的人来说，也是非常新鲜的材料，而且有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些社会组织结构的问题，这些是局外人很难想到的，仅仅是假设和推理是想不出来的。

我们研究所有三位硕士生、博士生经常参与这方面的活动，毛燕凌博士生是长期的参与这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起到协助作用，另外一方面，主要是交流。因为大家知道，学术研究离开生活现实，尤其是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如果缺乏对生活现实的了解和理解，研究做出来也没有什么作用，就变成了西方理论在中国套来套去，你弄一个理论，他弄一个理论，意义不太大。能不能更多的从中国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总结出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来，我们在学术界提倡的口号就是“不要拿西方的研究理论研究西方没有的问题，而是在西方没有的问题里发现出西方所没有的理论”，否则我们干了一辈子，何苦来呢？

最后我希望纪安德在今后的工作中越来越兴旺，谢谢各位。

郭雅琦：介绍几位刚来的嘉宾——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秘书长、也是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志愿者工作委员会主任，我们这次会议的支持者罗玫老师，美国CDC驻华机构代表赵金扣博士。还有刚刚赶来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子恩老师。

还有一些外国驻华机构的来宾、中外记者、我们的合作者，老朋友，就不一一介绍了，等到大家发言的时候，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下面请童戈先生和郭晓飞博士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

童戈：首先，我感谢大家百忙中来参加这个会议，为了节省时间，我用我诚挚的心来感谢见过面的和没有见过面的，但是给了我的研究工作很多帮助、指教的各位专家。我为你们给我写的信，为你们给我的指教，一直在深深地感动着。

我给自己的定位，用今年流行的话说，我属于一个“草根学者”。我所从事的研究，也就是“草根研究”，但我因此也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研究。至于我在去年完成的《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的调查》，今年又完成的《中国男男性交易状态调查》，这个调查在国内是不是填补了课题空白，大家自有公论。我想汇报的只是我在开展这个调查工作中，我自己从思想到精神世界发生的一个蜕变、一个变化。

坦白讲，我是在向万延海医生最早做的工作以及北京同志热线的朋友们这些工作以后，在1995年发生联系，才开始介入的。我基本上可以自己做一个结论，就是说，我当时的思想观念在那个时候基本是很传统的。当我去年开始做《男男性交易状态调查》的时候，最开始的调查是失败的，一个接一个的失败，我放不下自己的作家身份的架子，尽管人家也可以感受到我有点亲和，但是很糟糕，我放不下架子，人家不信任我，跟我讲套话，编故事。而我放下了这个架子，人家仍然不跟我倾诉，而是拿我当客人，把我当嫖客。接连的失败，我到了西安以后，在我们志愿者朋友安然的帮助下，我才探索到了合适的方法，就是需要被MB信任的人事先为我去做大量的解释、动员，达到人家知情同意的工作。我从最开始作调查，似乎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精神磨难，但是，当我最后能够把小孩儿们当成一个人来对待，而他们向我敞开了心扉，顺利进行这样一种交流式的访谈调查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小孩形成了对我的信任和尊重，他们又来帮助我动员他们的同伴接受访谈调查的时候，实际上，是我时时被他们感动着。包括雅琦，也在深圳和郑州见过这个场面和情景。如果下午有机会，我希望在郑州、西安、南京帮助我做调查工作的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情况。

我和MB通过越来越充分的交流，我不能不把这些孩子们当成人来对待，我们敞开心扉以后，我是不是在对他们做调查？这个痕迹很浅了。其实，他们是在跟我进行倾诉，甚至，最长时间的访谈，是从头一天晚上9点多谈到凌晨八点半。其他的，我认为我没有和他们谈到五六个小时就比较失败，谈两三个小时的，我认为我的调查就是失败了。而我自己通过这样一个研究实践、调查实践，我觉得我把自己改造了一下，我原来也在那么讲平等，而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脑袋里、内心里充满了大量的不平等的东西。我跟朋友们说的不见得准确，可以说，这



次调查把我改道成了一个彻底的人文主义者。

至于这次调查所能揭示的那些东西，潘绥铭教授给我的调查报告做的简明的序，已经说到位了。他们是一些很普通的人，为了生活，甚至为了人生的发展，在谋求着一种生存之路、生活之路。他们既不是我们出自传统道德说教的想象这么可怕或者可恶，也不是格外的可亲、可爱。这个报告提出，我觉得，首先在我完成这个报告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揭秘的心情，我不是在揭露人家的秘密，而是在描述着一群被社会，被我们主流的价值观遗弃的孩子们，如何在人生、在生活的道路上摸爬滚打，跌跌撞撞的努力前行，因为他们是普通人，不是圣贤，所以，他们有他们的弱点、有缺陷，他们有他们的恶。而当他们很坦诚地跟我述说着自己的恶，不断地问我“童老师，我是不是坏人”的时候，我要说，我内心真实的东西，就是逼迫我在反思自己是不是一个纯粹的“好人”。我总是对他们说，当你在受到歧视、压制，甚至伤害的时候，你在报复别人的同时，你却是报复了你自己。我也一样，我也有报复之心，但是，我希望我们以后都不要报复自己。

整体上来看，我的这个报告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我的思想还需要继续成熟。而我希望尽我的余生之力，我也快60了，余生不多了，我希望能够尽我的余生之力，能够为大家多做出一些“半成品的菜”来，我特别希望这些半成品的菜能为后面的研究者、后面的青年才俊们拿出更精品的东西，提供有价值的基础资料，让我们共同为人类的性文明建构努力做一点贡献。谢谢。

郭晓飞：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是我刚刚完成的一篇博士论文，已经通过了答辩。现在，我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我非常感谢为我的博士论文写作提供帮助的师友，我今天非常高兴潘绥铭教授能来，我在人大呆了六年，硕士、博士读了六年，读的是法学院，但是我经常逃法学院的课去听潘老师的性社会学的课，我觉得潘老师的性社会学的课就像是一个艺术品，我就当成一个艺术品去欣赏。我特别高兴他今天能来，我的这篇著作也成为他那么多年在人大讲了性社会学播下的种子所结的果子。

我更要感谢福特基金会，感谢李文晶博士，因为她的远见卓识，推动了中国本土的同性恋的研究。我曾经对我的一个好朋友周丹，所谓的同志律师，我跟他说过一句话，中国今后同性恋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特别希望，有一天，在我们城市里最好的

学术书店里，会有好几排的书架上放着关于中国的同性恋研究的书籍。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过程里，李文晶博士和福特基金会功不可没。

同时，我还特别感谢童戈老师。童戈老师的调查，材料非常的丰富，是他的案例启发我提出论文中非常重要的命题，就是法律阴影下的性。童戈老师也为我的论文写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我也非常感谢郭雅琦老师，无数次愉快与乐趣的交流，都化成了我的文章中的亮点。郭老师曾经提出过一个命题，说同性恋有没有和异性结婚的权利？我把他们的调查、他们的思想都熔化进我的思考里，我把它们掰开了揉碎了，融化进我的思考里面，不知道叫采阳补阴还是采阴补阳。

我感谢他们，不仅仅因为他们为我的论文出版提供了资金支持，更重要的是，纪安德咨询中心是我强大的精神背景，是我进行思想充电的地方。

接下来，我不能像童老师那么简明的讲，因为他的书大家都拿到了，我的书只做了三本样书，大家现在还没有拿到，所以我要详细介绍一下我的论文里都说了什么内容（内容已简略，详情请参阅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于2007年3月编印的《性别与健康·NO3》——编者）。

第一章，我分析了清代法视野下的鸡奸，我对照两个词，中国的鸡奸和西方的sodomy，sodomy可以翻译为反自然性行为，包括口交、肛交、兽交等等一系列行为，分别对待中国古代法的鸡奸法和美国sodomy法，这显示了中西方对同性性行为的不同想象。在中国的背景下，法律对于同性性行为的惩罚是世俗的道德背景。而在西方的语境下，法律对同性性行为的惩罚是宗教支撑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中国，鸡奸法在中国法律里进进出出，有时候规定，有时候取消，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在西方它会成为很多意识形态聚焦的地方。美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法官，也是学者，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按照西方的标准，许多非西方的文化看起来都太淫荡了，非基督教社会都不像基督教社会对性问题有那么多焦虑，这可能和我们平时的看法不太一样。

第二章，我分析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有过同性恋行为的非罪化吗？1997年，我们的新刑法废除流氓罪，在立法者那里，这跟同性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这个事被同性恋群区中理解为中国同性恋的非罪化。

流氓罪主要针对的不是同性恋，它的废除也不是因为同性恋，但确实，流氓罪的存在，司法解释和实践把同性恋吓坏了，我把这个称之为权力对身体的伤害，正是因为有了的身体的感同身受，才有了同性恋社区中对刑法修改的过度诠释，才需要这样一个说法，对身体的后遗症进行治疗。所以，中国同性恋非罪化的说法不正确，但是这个说法来自话语策略的原因，就是



用西方的强势话语在中国的背景下来论述同性恋权力的正当性。

第三章，我分析了一个在中国发生的同性恋卖淫案件。我们的法律并没有明确惩罚同性之间的性交易，在南京发生了这样的案例以后，层层上报到了最高法院，但是最高法院也没有做明确的司法解释，最后以组织卖淫罪定罪。我在文章中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同性卖淫可以和异性卖淫类比，那同性强奸为什么不可以和异性强奸类比？而我们的法律中，同性强奸是不为罪的，同性婚姻为什么不可以和异性婚姻类比？权力在哪一个类比面前停步了呢？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权力要惩罚同性之间的性交易，但是又不愿意把它明确化。这是为什么？

第四章，通过对于同性强奸案件的分析，我提炼出了这样一个转变，在古代的法律框架下，对强行鸡奸的惩罚是建立在维护社会风化的基础上，让男人和女人都一样守身，而现在强奸罪的课题不是道德风化，它更多的是对受害者权利的保护，强奸罪的保护课题是性的自主权。从原来古代不考虑主体感受的道德犯罪，到今天强调受害者主体人身权利的犯罪。所以，古代对同性间犯罪的惩罚没有遇到的问题，如今却不得不予以考虑了。……通过对性学领域建构主义和本质主义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我们眼中只有鸡奸行为、流氓行为，可是现在我们眼中是同性恋者，以往同性恋是不道德的，今天歧视同性恋是不道德的，以往同性恋是病，现在恐惧同性恋是病，这样一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都跟从行为到身份的转变有关系，理解了这样的转变，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同性恋话语在今天在某些领域会成为强势话语。

最后一部分，我探讨了中国的同性恋者和异性婚姻所遭遇的尴尬。我看到有些妻子是因为丈夫是同性恋者而要求离婚，而在离婚的时候要求过错赔偿。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分析，我认为揭示了主流价值观的尴尬，一方面，希望所有的人都进入异性婚姻，因为一种文化的强制，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是异性恋，而且一定要结婚生子才是正当的；另一方面，当同性恋和异性结婚了，又被指责为欺骗、侮辱。我认为这个批评，……以前没有这样的伦理困境，现在出现了，为什么会出现呢？……以前同性恋躲在柜子里感到很安全，社会主流也希望他们不要太张扬，双方达成了一种默契，而如今我们看到，在婚姻中，这样的默契不存在了。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主流在抱怨同性恋进入传统婚姻是一种欺骗和伤害的时候，主流什么时候鼓励过他们和自己真正爱的人结合？

小结——从清末的鸡奸立法到今天公共论坛和学术界的同性婚姻讨论，从原来流氓罪中被贬斥的流氓行为到今天的同性恋者，我分析了这个过程

是如何发生的，是什么样的社会变迁导致了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必须成为一个值得注意、值得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以布迪厄的一段话作为我的发言的结束，“我们的任务是为人们提供进入各种经验的途径，并且向大家阐述这些经验，不论这些经验是普遍共享的，还是少数人特有的，只要他们在平常是被忽视或者未加整理的，我们的工作就有它的价值”。

谢谢各位。

郭雅琦：不管是童老师的调查报告还是郭晓飞的论文，它对我们当前的性学研究和艾滋病干预、法律建设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当前艾滋病干预方面，现在也更多地投入了在男男行为人群当中的一些工作，政府、国际组织、全国各地的专业机构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童戈先生的报告也为我们能够在MB人群中更好地进行行为干预工作提供了借鉴。下面请专家对这两个成果发表意见。

李楠：先谈《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因为没有看到全书，只看了简介，听了发言，我觉得这是一篇少有的好论文。说实在话，现在在在大学里，学生的论文不多，连学生带老师都造出一大堆学术垃圾。

更主要的是第二点，不管是这篇论文还是童戈先生的《中国男男性交易状态调查》，对于我们不止是一个研究成果，更重要的在于它的现实意义。这就引出来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面对中国的真问题来给予思考、给予回应，促进我们这个社会更加和谐？我们往往是做不到这点的，包括在艾滋病防治的领域，我们学着人家的话去说，学着人家的事去做，我们很少真正敢于面对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这块站着世界1/5人口的土地上存在的真问题。我觉得，我们要能够面对中国社会的真问题，要能在开放的世界中和外部有一种对等的交流，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这两个学术成果，难能可贵之处，就是都体现出了面对真问题的勇气。

第二，谈一下艾滋病。因为这些事都是在艾滋病这个前提下、在这个题目之下做的。我一直认为，最起码在中国，艾滋病是远远超出一个疾病所带来的问题。也就是说，我强调，作为疾病的艾滋病和作为问题的艾滋病是不同的。而且我不像有些人那样认为，艾滋病作为一种疾病、一种传染病带来的灾害会严重到成了社会问题，而认为是社会问题的存在才造成艾滋病像今天这样的肆虐，尤其是在中国。

下面要谈到我们理想的一种境界：**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当我们中国转型之后，我们能不能比较顺当地走到这一步？我们能不能真正认识



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多元世界？我们转型有很多方面，比如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其中还有一点，从整齐划一转向多元一体，多元并不是过去不存在，而是我们不重视它，我们不能很好地对待它。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法律上的权利，也就是个人的选择，作为法学讲的权利也好，经济学最基础的是什么？是研究选择的学问，我就这么多钱，是买这样东西还是那样东西？有没有这个选择的可能，有没有这个选择的权利，这个选择的权利放在谁手里？选择的后果他能不能承担？那么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刚才童戈老师说的，一个是，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觉得平等了，实际上我们往往不是平等待人的；第二，不管是我们也好，还是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也好，实际上，作为研究对象，它不是客观地摆在那儿任你研究的东西，而是存在一个是否和你平等的关系。比如，刚才提到立法涉及同性恋人群问题，那么同性恋人群的意见参与进来没有？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标准是在外部还是在自己？就像刚才童戈老师说，有人问，我是不是一个坏人？那么，标准是在你这儿还是在别人那里？这是很重要的，第一点是选择，第二点是标准在哪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再有，既然大家不一样，我们能不能共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恰恰是需要一种良好的制度，需要一种法治、一种善治，需要一种良好的理念，尊重别人和自己不一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才是防治艾滋病所真正需要的，以及必须具备的背景。离开了这样的背景，我们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就做不好，或者是事倍功半。

回到我想强调的问题上，我特别强调每一个人自主的选择，在他自己做出选择的时候，又有两点需要考虑：第一，这个选择是不是负责任的选择？他对后果能不能承担？你自己选择了，你自己要承担这个后果。第二，你自己做出选择的时候，边界是在哪里？我觉得，唯一的边界是不伤害别人同样做出选择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性犯罪这样一个古老的罪种要从维护风化转变为保护个人的性权利。什么是个人的性权利？就是每一个人都有选择性伙伴或者是性行为方式的一种自由，它唯一的边界就是尊重别人的选择自由。当涉及两个人的时候，要两个人都同意。

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变化，我们都希望消灭歧视，但歧视不止存在在艾滋病领域，不止存在在性取向问题上，歧视问题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或者说在我们人类生存的这个世界上，仍然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希望尽我们的努力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走向平等，走向一个公正的社会。我们正面临这样一个变化，我们是不是都做好了准备？我们是不是都尽到了各自的力量？我们是不

是在强调民主的时候，在强调平等的时候只对别人，而自己的圈子中，在自己做事的时候，是不是言行不一致？这都是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我觉得，童戈的报告，郭晓飞的论文都在提出同样的思考。

谢谢大家。

戴志澄：我本来想稍微晚一点讲，因为听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既然童戈老师点名了，我就说一点感想。

首先，对纪安德咨询中心成立10周年表示祝贺。刚才雅琦做了一个非常简要的工作报告，其实，实际的工作大大超过他的这个报告。这10年，尽管他们非常坎坷、非常艰苦，但在他们自己的努力下，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特别是福特基金会、马丁基金会这些国际组织在资金上的大力资助，加上他们自己的努力，尽管十年的时间不算很长，但是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这个创业过程很艰难。一直发展到现在，除了能够从事一些公益活动以外，而且还能够组织、协助很多机构、很多专家来做这么一些很重要的研究工作，在“同志”人群里的研究工作，我觉得非常不简单。

我们协会和雅琦，以及纪安德的关系也是特别密切，他对我们协会工作的支持很大，特别是在协助一些国际组织的一些项目，包括一些调查研究，大家可以从很多书里可以看出。在“球六”项目的申报过程中，纪安德也是大力支持，参与了很多很重要的工作，特别是郭雅琦本身，做了大量的工作。所有这些，我们都表示祝贺和感谢。

对这两个研究成果，我的脑子还是在思考的过程中。这么一大本的书，50多万字，要用很短的时间来加以评价，确确实实应该说是非常困难。郭博士的论文还没有看到，只是听了他的介绍。如果现在就来做一些评价，确确实实是比较笼统的，或者说是比较主观的，也不太准确。但是我可以这样说，关于《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这篇论文，我很同意李楯教授刚才讲的，应该说对研究这个人群法学方面的问题，是比较深度的揭示一些本质问题的研究。但因为没看到原文，只是听了刚才郭博士介绍的五点，对法学来说，我是外行的外行的外行，一点皮毛都说不上，但是看了这个提纲，过去在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从预防控制艾滋病方面来说，知之甚少，更谈不上可以拓展到关于同性恋的一些人文社会学有关的法律视野。我相信，你的论文出来以后，我应该很好地学习，因为要做这方面的了解，要对这个人群进行社会人文科学方面的了解。你这篇论文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至于童戈老师的《中国男男性交易状态调查》。我和他是老朋友了，



我非常佩服童戈老师，因为这不是你的第一个作品了，不是你的第一个巨著，是第二个巨著。我认为，他的研究应该是这个范畴里的一个巨著。

我不知道你花了多少时间？

童戈：从2004年开始涉及，到现在。

戴志澄：两年多、三年的时间，应该说，这是一部巨著。因为我读过很有名的性学家海蒂的“性学三部曲”，一个是女人篇、一个是男人篇、一个是爱情篇，也是三本。我看童戈老师写的正像这三本书的三个特点，学术方法的突破、研究方法的独特、人文思想贯穿始终，我觉得这个概括非常准确。

我们协会在2004年专门碰了一下这个工作，开展社会动员项目，做MB和艾滋病的关系，和四川艾滋病协会一起做，花了大概10万块钱。仅仅只是涉及这个人群的艾滋病问题那一点，他们都做得非常非常困难。如果说那个工作和童戈老师的这个研究来比较，真是没办法比的。我看童戈老师的书里讲了一点点性病和艾滋病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学着做的就是这么一点，而大量的其它问题都没有涉及到。

这个研究，加上童戈老师去年的研究，都突出了三大特点，学术思想上的突破，研究方法的独特，大量的访谈，非常细致的、方方面面的，凡是能够涉及到这个人群的有关问题基本都访谈过，不然没有500多个这么多的案例。这本著作的问世，对今后研究这个人群应该说是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包括我们从事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的工作，也要很好地研究这本书所阐述的特点和现状，以及他们的心理想法和深层次的一些想法、一些深层次的心理活动，这些今后都可以运用到这个人群里预防控制艾滋病上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资料，也可以是这方面很突出的研究成绩的结晶，将来可以很好地应用到性病艾滋病的研究上来。

我可以说是乱评，在此先表表态，回去以后好好学习一下，将来凡是能够应用到我们的工作中的都尽量应用。

童戈老师在国内的同志人群预防艾滋病领域，做了大量工作，贡献很大。我不同意你刚才讲的你的岁数大了，你才多大？57岁，在我们这儿好多人都比你大，应该说，在学术研究领域中，你正当年，正是经验最丰富、精力最充沛、阅历最深厚的时候。我和童戈老师接触比较多，非常钦佩他，他的思路非常敏捷，为人非常厚道，在这个人群里确实有很高的威望，知识也非常渊博，希望今后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里你可以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希望你保重身体，能够利用你这个精力最充沛的时间为这

个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以上我是乱讲的，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正。

金德初：我也随便拉扯几句。我从1500公里之外的南方上海，告别年迈的、瘫在床上的父母，到北京来，来干什么？来学习的。因为童戈老师的这本著作，以及他的前面的著作，还有刚才郭博士的论文，对我来讲，都是感到很震撼的。

我想到，美国人有好多东西很值得他们骄傲，在性的研究方面，他们有华生、有金赛，他们研究性的生理、心理、社会的关系，我们中国人没有，因为我们被一些客观条件限制。但是，我们也开始有了自己的东西。正像潘绥铭教授讲的，我们要研究自己的，人家没有的，我们要拿出自己的东西来，其实人家有的，我们也可以拿出新的东西来。

我认为，童戈老师的调查研究，是在社会心理、文化领域的一个科学奠基。因为科学正是从真实来的，我们要求真，要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人、行为、心理，他们是怎么活动的，以前我们没有，现在有了开始。今后我们科学的工作是可以从这儿开拓的，我认为这个价值就在这儿。

我非常高兴能够看到这样的成果。纪安德咨询中心这几年的活动，也是对我们中国、对我们人类的奉献，我是这样想的。

讲到我们中国一些问题的时候，有些人是沾沾自喜的，我们确实有一些深厚的、宝贵的，人家所没有的古老积累，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要是客观一些就会发现，我们也欠缺很多，我们在很多地方还是比较贫乏的，比如在科学领域，我们缺少根基。这个根基怎么来？就是要像童戈老师那样，要从实际中发掘事实，这个根基就慢慢建立起来了。

还有郭晓飞博士的《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写得确实非常好，我自己有时候东看西看，也看了一些东西。我就想，法的概念是不是还可以扩大一些？我想到法国的思想家卢梭说过一点，法律的概念其实在我们人类古代就有的，风俗习惯就是一个法。童戈老师昨天晚上跟我讲过，确实，世俗的观念，它们也是禁忌，有些东西是非常厉害的，这也是世俗的“法”，甚至比法律还法律。看到这一点，这对性行为、同志、异性婚姻都起着很大很大的制约作用，这比法的力量还要强大。

刚才郭博士讲到一些我们不了解的情况，我们中国的法律是把有些东西掩盖了，这些东西我们都应该研究，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有一个极大的差异，西方文化的冲突是亮出来的，比如讲计划生育，美国有一个早期倡导者，他因此几次被投入监狱，中国没有。难道，我们因此就比



他们文明吗？不是的，我们的很多东西，矛盾、冲突，思想领域的都是掩盖住的。现在改革开放到了这个地步，很多问题都亮出来了，我们才刚刚开始，但是很多方面都是前途无量的。

何景琳：大家上午好，不好意思在这么多专家学者和社区组织面前班门弄斧，我想讲三个方面：

第一，每次纪安德召集会议，我都想无论如何要来，因为我会得到很多新的信息。我记得在2004年11月参加童戈老师完成的《艾滋病行为干预方法研究》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童戈老师说“自己人研究自己人”，所以这句话我一直在很多会上都说，社区的参与非常重要，要自己为自己做事，要自己推动自己社区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学到了很多知识，开拓了思路。今天也是这样，无论从郭雅琦的十年网站和五年纪安德成立的总结，以至于这两个研究报告，同样会给我们很多启示和很多信息。这部著作我们可能会需要以后慢慢学习和消化，非常的有意义。在我们艾滋病预防工作中，这些信息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一直强调艾滋病的预防工作，实际上是我们如何能够干预高危行为，这里可能会给我们很多启发，所以非常感谢纪安德。

第二，因为看到了我的很多老朋友，尤其是李文晶和牛彩霞，都是老朋友，还有她的老板也在这里。从我做艾滋病领域开始，一直也和福特基金会有很多的合作和交流，我也代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感谢福特基金会这么多年来一直支持中国的很多重点领域，或者说是空白领域，以至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方面，真的给予很大支持，真的要感谢福特基金。也希望以后中国的草根组织或者其他的机构，能够得到福特基金的更多支持，也希望从联合国的角度更多地和福特基金会有合作。

第三，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现在也正在准备启动的联合国在中国的艾滋病防治的联合项目，2007年到2010年，这个项目也把男男性行为者的干预工作纳入到国家的工作框架中，我们也希望在联合国专题小组下的工作小组在联合项目的框架下，能够进一步在中国和相关组织、相关机构和个人开展有关合作，来推动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在艾滋病经过性船舶的领域做一些工作，阻止艾滋病的传播。

李楯：第一点，艾滋病防治和对同性恋人群的尊重，这既相关，同时又有它各自的独立系，不是没有艾滋病防治我们就可以歧视他们。

第二，因为这本书我没有看，我提一个问题，他写了包括对清代的

法律，也就是传统法律的分析，不知道当他分析现在存在的问题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中国不同于外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在法律观念上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它和一般的与西方不同的中国传统有哪些不同？因为，现在我们面临中国的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如果我们不考虑我们的计划经济时期留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思想、精神遗产，我们是不是要守着这些遗产过后面的日子，我们的很多结论和很多具体行动都会是似是而非的。

万延海：我问郭晓飞一个问题。1997年的刑法改革，如果不作“同性恋非罪化”的解释，应该做什么解释？你的报告里提到，那次刑法改革没有为同性恋的立法意图。你可能不知道立法者的真正意图。但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国同性恋运动发起的时候，那些幕后的同性恋者们，他们在政府里面，可能是在国务院里，也可能是在议会里。当同性恋运动发起的时候，在政府体制内的，在议会掌握权力的那些同性恋者会有行动的，他们的行动可能比在外面举着旗子游行的更有效。我觉得你的解读似乎有一点点草率，似乎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立法者对于同性恋问题究竟是什么意图。你说不能作“非罪化”的解释，我真的不清楚，我们对1997年的刑法改革在同性恋问题上应该作什么样的解释。

郭晓飞：刚才，万老师说到对1997年新刑法流氓罪废除和“同性恋非罪化”的关系，应该做什么解释。我们法学界理解的流氓罪废除，跟确定“罪刑法定”的司法原则有关系，也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以前，我们是类推的，但是有了“罪刑法定”原则之后，不允许类推了，而且不允许“口袋罪”的存在了。原来的流氓罪是一个大大的口袋，男女之间的、同性之间的，大量我们现在看起来都不是犯罪的行为，什么投机倒把等一系列的问题，都放在了流氓罪的下面。“口袋罪”太大了，很容易随意的出入人罪，所以有了“罪刑法定”，要求定罪的边界要非常清楚。所以，流氓罪消失之后，分解出四个罪，就没有了关于鸡奸。

我认为，它不是“同性恋非罪化”意图的体现，很重要的原因，在西方的法律意义上，非罪化是有特定内涵的，不是没有了鸡奸罪就是鸡奸行为的非罪化。如果说鸡奸罪在法律中以前有，现在没有了，就叫非罪化，那么，在清末修律的时候，鸡奸罪就消失了，如果认为那也是非罪化的话，也可以把它的解释为是同性恋权力的胜利。

立法者的意图你是否知道？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的背景下，非常强调的



是多元的解读。我刚才已经说了，在中国社会的背景下，把刑法改革进行“同性恋非罪化”的一种解读，那样的解读原因是非常正当的，是非常好的一种策略性的解读。但是，我是从法学理论的背景下，企图清理不同的解读。

后现代的理论是说“作者之死”，作品完成以后作者就不存在了，每个人都可以去理解这个作品，如果把后现代的思潮放到法学里面，我们同样可以说“立法者之死”，就是立法者立完法以后，你就可以认为他已经死掉了，他的立法意图你可以做多元的解读。但我之所以说这不是同性恋的非罪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流氓罪的司法解释里有一条，主要针对的是强制的鸡奸，就是强迫的、威胁的、多次实施的鸡奸，还有对小孩儿的鸡奸，对14年龄下小孩儿的鸡奸。如果连这些东西全部消失掉了，是值得同性恋弹冠相庆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有时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自从流氓罪没有了之后，同性强奸在我们的刑法里也彻底消失了，而且非罪化在西方意义上是无受害人的非罪化，原来成年人私下里的相互同意的同性之间的性交，在西方原来认为是罪，后来不认为是犯罪了，因为它无受害人犯罪。但是中国的流氓罪是有受害人的，它没有了之后，那些有受害人的犯罪也没有了。所以非罪化应该是无受害人的那些罪的非罪化，而不是应该是有受害人的性行为的非罪化。

这是我的理解。

赵鹏飞：大家好，我是赵鹏飞，来自于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很荣幸参加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这样一个成果发布会，在此表示感谢。实际上我想一直听到再谈体会。我以一个过去的研究者的身份谈点看法，以前我也是做研究，看到两位专家在福特的资助下有了这么高质量的，少见的产出成果，所以我感到非常鼓舞。

童戈老师的这份报告，我从拿到“征求意见稿”就读，到现在还没有读完，这是巨著，也是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因为我比较了解他的思想是什么，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我们有幸一起沟通、一起交流，他的思想很深刻，很敏锐，也很透明。我们一起到同志吧、拉拉吧，到MB工作的场所和环境，看到他非常受大家的尊敬，也看到他和MB象朋友一样。现在，他把目前的现实存在、活生生的这些现实，都一览无余的给我们写了出来，我很高兴。这里讲的是MB，以后还要把MG也写进去。关于MG怎么定义，我们也谈到过，现在有鸡、鸭、鹅，是不是社群，拉拉把MG叫成燕？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定义。但是，我们看到目前确实有向拉拉提供服务的异

性恋的女性，对这样一种事实的研究，确实非常必要。

虽然我没有看到郭晓飞论著的全文，但是从他五条的小结来看，确实有很多信息，我还期望能看到这本书。这对我们，至少对“性”的问题，对“性”从社会的、法律的视角看问题，都是一些新的知识，对我们将来的工作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我是一个研究者，我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够被接受、被利用，这么难得的知识怎么用起来？这是我很关注的问题。但还要实事求是地说，童戈老师这本书，我可以坚持花时间去读完，但完全读懂，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我虽然不能把它放在枕头旁边，至少放在书桌上，信手拈来，逐步理解。因为，这是和自己工作有关的问题，我会时时去参考。

在郭雅琦的十年热线、五年纪安德的总结中，也提到了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我们很荣幸，也很高兴有机会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和纪安德，和纪安德有关的专家，象童老师合作，在同志人群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在中国同志社群艾滋病干预工作回顾，以及行为干预实施指南的这些课题开发中，一起合作。我们的合作非常富有成效，非常愉快。

为什么我们会愿意进行合作？也是考虑到我们同志社区里广泛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各种主流渠道又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我们需要和纪安德合作，对许多现实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索。

当然，下一步我们就要跟政府的机构，比如国家CDC，怎么在现在的工作基础上进行合作。按道理，如何为同志社群开展有效服务，如何提供他们愿意接受的服务，社群里的志愿者，社群里的工作者，社群里有实践历练经验的人，才是真正的专家。从世界卫生组织的角度来说，我们愿意把这些精华的智慧总结、提炼，然后通过与合作，在更大的范围里加以推广和利用。

第三，我们讲同志、讲MSM社群的艾滋病预防工作，但大家知道，这个不仅仅是安全套和润滑剂的问题，比如，刚才大家讲的病理化的问题，非刑事化的问题，我们针对这些问题，还要考虑怎样为控制艾滋病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包括政策环境、社会环境，提高宽容度，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同志、同性恋、男男性行为是一种现实存在的行为。我们进行预防艾滋病的行为干预，我们干预的不是这个人群，这个行为本身，而是干预和艾滋病有关的危险行为，怎样把危险行为转化成对自身、对他人都没有疾病传播危险的这样一些理念。所以，做这个工作，当你面对政府官员，面对警察，面对医生，面对同志社群，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正确态度，传播基本正确的信息。这些基本的观点我们还要大力宣传。



我跟郭雅琦、童老师合作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个问题，站在我们世界卫生组织的角度，那些传统的医学权威对同性恋问题的解释，他们的那个态度怎么转变，现在很关键，也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怎么改变那些处于精神病医生、心理医生位置上的人，在MSM的用词、用语方面正常化，不要继续把他们再当成病人，我们也要进行一些努力。

歧视的问题，可能大众的问题容易解决，警察的问题，对他们提供正确的资讯，他们也能够转变态度，而往往是那些学术的，或者理论观念的转变，比较困难。比如对艾滋病病人的歧视，有些大夫的歧视比非医学人士的歧视，负面影响更大。同志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也呼吁福特基金会对此有一些支持和资助。

我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在艾滋病预防的问题上，我们和同志人群结下了不解之缘，切入点还是从艾滋病来的，包括政府也好、学术机构也好、我们公民社会的倡导也好，我们也有一些体会，想和大家分享。

我把它总结成六有六缺：

1、有需求，缺资源。资源不够，当然国际的NGO和社团，象福特基金会，给了很大的支持，但主流社会对这个人群开展工作的必备经费还是缺乏。

2、有活动，缺规模。全国很多地方开展了零星的小规模的活动，宣传、教育、干预，临床服务等等，但规模上不去，这样，遏制艾滋病、性病的流行和传播的效果就很有限，只在国家的层面，省一级的层面就到不了。

3、有愿望、缺环境。有很多有识之士和技术机构、社团组织，国际机构，都有在这个人群的性病艾滋病控制工作中做出一点贡献的愿望，但是大的环境、支持性的环境的改造还有很大的缺口，认识上，政策上，知识传播上，我们对这个人群的正确了解还缺乏环境条件的改善。

4、有热情、缺规范。我们到各个省，甚至县一级，看到很多志愿者，工作热情很高，但是缺乏技术、技能、技巧的掌握。如何把我们掌握的知识，把我们掌握的有关预防干预的信息提供给他们，所以我们开发了一些实践指南，使有热情的小组能够采纳，开展规范的服务。

5、有队伍、缺系统。我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很多地方都有各种志愿者小组，有不同的网站、热线，具备了行为干预工作的队伍，但往往比较分散、零散，很多地方互相之间还有资源的竞争。我们鼓励正当的竞争，但是在支持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也在发生一些不正当的竞争。比如我们在深圳、广东支援的项目里，也会看到志愿者之间的不正当竞

争。我认为，要倡导团结精神，有时候，这种摩擦对我们争取支持项目有影响，对支持资源的使用和发挥，不会达到很好的效果。这也需要倡导我们志愿者小组将来能够形成一种网络，相互之间互补的、支持的协调的网络，会更加有利于我们推动这个人群的工作。

6、有服务、缺利用。这也是我们聆听到很多志愿者、很多社区人群的声音，CDC 也说，我们有了免费自愿咨询服务，甚至开了很多同志门诊，都有非常好的服务，但是利用率还是很低。可能是两个原因，一个是社群不知道有这个服务，一个是你们的服务是不是适应社群的需求。你讲你对同志是很好的，但有的同志亲自应用了你的服务以后，可能觉得不是这样，不能建立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这点我们要向同志社群去了解，什么样的服务才是可以被他们认可和接受的？这方面我们也是在积极倡导，我们在开展项目、开展服务的设计、实施过程中，努力把更多的同志人群吸收到我们的项目里来。这样，我们的项目会更加有效。

最后，再次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希望这两本质量这么高、提供那么多资讯的书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加以利用，来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

郭雅琦：刘惠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介入到同志人群中帮助同志人群做性病支持的医生，现在是官员，也给了我们很多支持，请她发言。

刘惠：不敢当，我只是比较早地和北京同志热线、和纪安德咨询中心接触，参与了他们的工作。我从1997年开始参与他们99575北京同志热线的培训工作。他们这十年的发展过程，我可以作为一个见证者，所以，我今天坐在这儿，感到非常高兴。

我认为，纪安德咨询中心能够取得这样令人瞩目的产出成果，取得这么大的影响力，是在情理之中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么多年来，从热线到咨询中心，他们一直都保持着很好的独立性，同时，他们对自己的努力目标很清楚，而且有一个很清醒的思维。他们这么多年不受外界任何的干扰，也不去扯任何的是非，和他们接触，无论是雅琦还是童老师，他们嘴里没有那些小是非，思考的都是大的问题，领先的问题，深度的问题，他们也都在默默无闻地，非常认真的做这样的工作，在奉献着。所以我觉得，他们今天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理所应当的，刚才各位专家给他们的称赞也都是非常公正的，我对他们取得的成绩也表示祝贺。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无论是纪安德还是他们的前身——北京同志热线，他们做的，都是不重复别人的工作。我刚才说了，他们总能非常



敏感地感觉一些问题、发现一些问题，他们也不回避，同时就去探索这些问题，并有思想，有能力上升到政策和策略的高度，提出他们的可行性意见。这个不是我的主观看法，大家可以看到，包括我们看到的很多他们的出版物，他们给我们做这个领域的工作，及时的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警醒，也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修正思路和建议。

我希望纪安德中心今后能够继续保持这种敏感性和探索性，为我们这个领域的人的工作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

话题回到这两本书，这是不同领域的两个非常好的研究结果。而他们的研究，对于我们做艾滋病防治工作，我们针对不同领域的人，应该跨领域了解的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针对MSM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无论从政府到民间都非常重视，投入也逐渐增加，各个方面的组织，包括NGO、草根组织都在积极参与这个工作。将来怎么能够在国家的投入上取得很好的效果？对男男人群，无论是艾滋病防治还是反歧视、社会环境的改善，都能够达到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很好研究的课题。这两本书，还有童老师的其它研究成果，我觉得，是在给我们的研究奠定着基础。

我建议，对这本书，无论是福特基金会还是其他的组织、机构，能够给予进一步的支持，让他们的产出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影响决策者的思维，进一步产出政策性的东西，进一步指导我们的工作，这是我希望看到的更大的、更好的结果。谢谢大家。

崔子恩：我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我是纪安德和童戈的老朋友，今天我特别高兴，来了之后特别欣慰，在这甲能见到很多老朋友，见到李文晶博士，见到潘绥铭教授更让我感到意外。我觉得这次会议真正打破了学院派和草根派之间的界限，所以让我特别特别兴奋。同时，我也要表示对我一直关心和合作的组织——纪安德，对郭雅琦的祝贺。

纪安德从成立到现在，经过了特别坎坷的历史，当然都是因为工作方向的创新性而造成的坎坷。刚才大家也有所回顾，我在这甲就不多讲了。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纪安德很有勇气在一个民间立场上在做学院派做不到的事情。这点，是我特别兴奋，特别高兴的。

我自己处在学院派的位置，我也特别想做一些纯理论的，对同性恋问题的研究，包括对MB的研究，我也在2003年试图开始做，但都搁浅了，原因很多。现在童戈先生在纪安德和福特的支持下，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工作，我觉得让我很意外，同时也让我感到，对同性恋问题，来

自于社会、来自于某种体制的支持力量越来越大，环境的支持越来越大。因为，这样的研究，完全凭借个人的力量去突围，可能还是完成不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慨。

在童戈完成这两部著作的过程中，我恰好和他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同感，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作家出身，都写小说，我们几乎是同时在香港出版我们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作品。现在童戈顺利转型，成为了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同性恋议题研究学者，而我现在还停留在我的作家和导演的身份上，我其实很羡慕他现在所做的工作和他的转型。不过，因为有他的成功转型，所以我就不用转了（笑）。

童戈的两本著作，其实我都一字不漏地读了，这本书读得多一点。我从2003年开始做中国男妓的纪录片，后来拍出来了，叫《夜景》，雅琦和刘惠在其中都有出现，作为专家访问的部分来表达对男妓、对艾滋关怀的看法，其中也访问了张北川、李银河、甄甲等一些朋友。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其实我很想做一本类似男妓的社会调查的著作，但是后来我在做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男妓讲的故事是编的，讲的是台词，我无法分辨，因为他们的名字是化名，他们来自于哪一个省、来自于哪一个城市、年龄多大、什么样的家庭背景，他们都经过无数个版本的创作，这使我自己有一点晕，让我感觉他们在片子里有一点像演员，所以后来我真的请了一些专业演员，和他们混合在一起，扮演男妓，也让这些男妓扮演了他们理想中的形象，上大学、找一个女朋友或男朋友结婚。如果是同性恋合法化，他们很高兴，就说要和一个男同学结婚。他们的这样一些自我的分裂或者说戏剧人格，给我带来的感受是艺术性的，是非学术性的。后来，我的学术工作没有做下去的原因，就是我没有办法真正地用很多的时间像童戈这样深入到他们的生活里，把他们的方方面面、真真假假，把他们的表演、他们的愿望、他们的本色都清理出来，我没有这样的时间，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我现在除了羡慕童戈的成功转型之外，也很佩服他。他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作家，现在又能够在社会调查方面沉得进去，不是依靠自己的想象力，而是依靠自己对于现实生活踏踏实实的把握，同时又有系统、深刻的理论分析，我现在又变成崇拜他了。这个话说出来，有一点对朋友的溢美之词，但也确实是我由衷的表达，我们是多年的朋友，如果没有一点崇拜的话，是做不成朋友的，这也是真话。

郭晓飞是我认为最有才华的年轻学者，他一出手、一讲话、一写文章，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惊艳。这个话有学术性、也有文学性的含义。他的研究在填补空白方面和他对于同性恋的法律观察上，完全是视角独特的，而且是一步到位的。他的论文，他的思想不需要等待时间的检验，我



认为现在我就是时间，我代表时间已经检验过了，他的论文经得住时间的推敲。有郭晓飞这样的人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因为人民大学有潘绥铭那样的教授，当然，潘老师不是法律系的老师，但是他的影响肯定会波及到法律系。我认为郭晓飞的学术成绩不是来自于法律系的教学，而是来自于社会学系。

郭晓飞：我已经说过了。

崔子恩：（笑）这可能又是一个巧合，是我们之间的默契。

最后我说几句感谢的话：感谢福特基金会一直支持纪安德，支持童戈的研究，感谢罗玫、感谢艾协一直在支持雅琦，一直在支持同性恋和艾滋预防的工作，我也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给我带来温暖目光的朋友们，谢谢。

萨拉：非常感谢各位给我这样的机会来参加这样一个研讨会，我简单说几句话。我是福特基金会纽约总部人权项目部的主任，李文晶女士是我的同事，她负责北京办公室的性与健康项目。我们非常自豪能够支持这样的项目，这样的项目是非常具有创新性的，非常前卫，起着先锋作用的项目。

我简单说一下我的想法，今天两部著作的发布会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的发现都非常重要。同时，各位专家学者对这两本书的评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包括学术方面的、社会学方面的，还有法学方面的，特别是正如童戈先生所说的，有很多人文方面的信息，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刚才那位世界卫生组织的朋友所说的，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我想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方面，这是预防艾滋病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预防艾滋病的传播，同时，通过这样的研究工作，我们可以消除对同性恋人群的歧视和羞辱，从知识方面和态度方面教育大众，我鼓励大家继续进行这样的探索，福特基金会还会继续资助这方面的研究。

谢谢。

张孔来：我来谈三点感受——

第一，这个会议，又让我回顾艾协在2000年组织讨论同性恋和艾滋病之间的关系，那时候，会议的标题是“全社会参与”，连同性恋这个字眼都不敢说。今天，我们可以明白的说，这是开《中国男男性交易状况调查》和《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的研讨会。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进步。而发生这个进步的很大原因，就是同志本身的努力，加上

对同志关怀的同道和学者们的努力。这一点，我很有感触。

第二，我在想，同性恋的研究，童戈先生强调的是同性“性”问题的研究，原来基本局限在学术界，现在，我们对童先生、郭先生的这本书，也只是在引用，在学术圈子里造成一些影响。可是，我想，我非常同意刚才刘惠讲的意见，我们要把这样的成果不是只限于今天参加者的领域里讨论，这只不过是切入点，更主要的是，让这样的东西怎么去促进我们的社会变革，真正从和谐社会、尊重人权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怎么从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我觉得，是时候了。我对这件事情怎么操作更合适不知道。我觉得，看书中有些东西写得太专业了，太理论了，恐怕一般人看不懂，我们看起来都有点费劲，最好能转换成更直白的语言。我也更希望两位作者把书中最重要的东西总结出来，以后我们碰到任何场合都去讲，不只是在艾滋病圈子里，可以在任何场合讲，这是非常要紧的。

我希望福特基金会再接着支持他们做这样的事。我个人和福特基金会牢牢的关系，它是我们最早的支持者，我们艾滋病工作网络委员会是不会忘记福特基金会在最开始就支持我们的民间组织、支持草根组织，支持社会进步、社会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希望福特基金会继续进行支持。

第三，我以前不认识郭晓飞，咱们在不同的场合可不可以再组织一些更通俗、更精炼的演讲，把你们所调查的结果，都是一些事实，这就是科学，都反映着现实，能够把这些知识，这些新思想，传播给更多的人。我刚才讲的是影响政策、影响决策者，但还要让更多的一般公众、普通人理解。

我是真心的祝贺童戈，他正在成为大家啊，我们几个博士生都在非常认真的学习你的这几本书，三四本书了，真的是具有很高的指导价值，真心谢谢你们。

罗玫：我说一下我的体会，我是从2000年，就开始和童戈老师，和纪安德接触认识的。这几年，我们的认识和交往中，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首先，我觉得在和他们的交往过程中，对我是个难得的学习过程。确实，对我们来讲，以前对他们这个群体，还有关于同志问题的理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空白的。就是前两天和童戈老师聊天，我都有收获和启发。每次，我都得问他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是不理解的。

另外，我觉得也要学习童戈老师这种耐得住寂寞的精神，或者说是



修养。如果一个人想做一点事情，必须耐得住寂寞。我感觉，现在整个社会是一个浮躁的社会，发展飞快的社会，很多人都是很浮躁，很多事情很容易在表面上做得轰轰烈烈，但是真的扎扎实实拿出来经得住时间和实践考验的东西，却并不是很容易。所以，童老师的扎实，在浮躁的现实面前不求功利，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清醒，并形成自己的独到成果。这让我很钦佩，同时，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反思。这是我的第一个很深的体会，对童戈老师，对纪安德的很真实的感觉。

第二，因为没有看到《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这本书，刚才翻了翻介绍。对于童戈老师的这个调查和去年的《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我去年和童戈老师多次谈，这个书就这么出来了，仅仅是出来了，就太可惜了，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比较具体的后续研究。我早上和童老师也说了。去年纪安德开年会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童老师的《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就象张孔来老师说的，里面有些理论，看中文都挺费解，因为我们不是做理论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最有价值的是那400多个案例。我这个人比较实用，如果从艾滋病防治的角度，我们来认真的分析这些案例，也许我们就能找出有效的工作切入点，在什么样的场景、对什么样的行为，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什么样的工作，这些案例可以给我们许多启发。这个工作我还没来得及做，童戈老师接着就把第二本书又拿出来了，这里的案例更多，有500多个。这900多个案例，如果我们要分析出来，我觉得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做艾滋病防治，我可以从艾滋病防治的角度分析，如果做社会科学，可以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去分析。所以我觉得这两本书应该是源自民间，反馈社会，这本书的成果是来自于最最基础、最最朴实无华的，有一些故事童老师也给我讲过，都是真实发生的，实际上，这些故事的后面，如果仔细分析，都有很多可以再研究的东西。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这两本书，可能各取所需，对我们都会有帮助。

童老师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为自己形成的研究做这些后续的事情，那么，他在开荒，我们怎么种地？这是我从去年就在想的事情。

第三，是对我们的一个反思和启发，刚才我和翁乃群老师聊了两句。我忽然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在面对一些敏感问题的挑战时，能不能也对一些敏感问题，就象刚才崔子恩老师说的，我们用民间的研究，去做学院派、理论派不好做的一些事情。虽然童老师的书的印刷不是很精美，但是很朴素，这对我也有一个反思。

谢谢大家。

赵金扣：我利用很短的时间讲一下，应该说美国CDC的项目从2004年开始，我们进入这个人群是由雅琦的帮助开始的。他帮我们介入到这个人群中进行了一些调查和干预工作。

我还是讲艾滋病方面的事情，因为我们更多关注的，还是这个人群的艾滋病情况，他们的行为情况。有一个信息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2004年、2005年、2006年，我们都在北京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艾滋病的形势一年比一年严峻，从2004年开始调查的时候，雅琦把我们介绍给很多同伴，那时候的HIV感染率只有0.4%，而2005年是4.6%，到了2006年是5.8%。而且，这其中不但HIV感染率很高，梅毒的感染也很多，现在，梅毒的感染率是15%，既往梅毒的感染率是35%。而讲起安全套，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进行肛交的时候都没有用安全套，这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的现状。

我就想到童戈先生的这两部巨著。他的研究，无论对我们真实具体的了解这个人群，还是寻求工作方法，包括促进政策的进步，都是非常积极意义的。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学、文化学，我觉得还有历史文化的东西，这些理论的外行，还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所以，刚才张孔来教授也讲了，能不能对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做一些简明扼要的解释，这对于我们今后的计划和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上午的研讨结束。）

郭雅琦：我们继续上午的讨论。有专家讲，上午的讨论有点太严肃了，希望大家在下午的讨论能够活跃一点。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也跟一些老师交流了一下。我觉得，上午大家对我们工作的评价比较高，这一高，就让我感觉有些晕高，有点恐惧了。我们这种草根组织，越做压力越大，我们发展的方向在哪儿？如何保持这样一种状态，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或者更多的成果，光靠我们自己可能越来越难了，如何去吸引更多的专家、更多的学者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这可能是我们今后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也希望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在讨论这两部著作的同时，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意见。

李扁：我上午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是带着一种非常强烈的窥私欲来参加这个会议的。我看了童戈老师的书，觉得就像王小波讲的，人有阳的



一面，有阴的一面，而真正的学问可能就在阴的一面。童戈老师的发现，我觉得在阴的一面让大家了解的东西越多，大家的自我感觉，自我身份的自信心，就会很健康的成长。

我看了纪安德十年的成长，感到非常了不起。我涉足与性有关的事情，时间还很短，去年搞了一个中国性学论坛，提了一个很豪迈的口号，叫“先有一个圈子，后有一个时代”。

看到纪安德的奋斗历程，我觉得启发很大，要坚持，逐渐的有这么多人，有这么一个圈子，在创造着未来的时代，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启迪。

对郭博士的《中国法视野下的同性恋》，我觉得，学者不光要走出书斋，走进田野，还要走向庙堂。如果学者老是做书斋里面的研究，没有传播，没有社会实践，就很难影响国家的法律框架。

去年，我也提出一个“违宪审查建议书”，认为刑法里对性的整个的定义就是淫秽，这要改了，怎么改？公民有权提出违宪审查，他改不改是他的事，咱们有权提出。

文化有几个层面，符号、价值观、规范，规范有道德规范、习俗规范、法律规范。刑法巩固了“性即淫秽”的价值观，如果不改的话，很多问题无法解决。

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媒体推广。咱们做的很多事情，每传播一个人，就解放了一个人。咱们的这些调查、这些真理、这些发现，我是反对什么都说创新的，我觉得，不能所有的问题都讲创新，我有一个提法重新发现原理。童戈先生重新发现了真理，郭博士重新发现了真理，就要通过传播渠道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真理。

我在做一个小的课题，怎么让两个大的NGO，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教育学会，一起办一个艾滋病防治教育。让这些有关的成果通过对教师的培训，推广到一万个高等院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普通中学里面去。我希望各位专家能够在咱们这个渠道早起一些传播的作用。

与会代表提问：刚才您说“每传播一个人就解放一个人”，能不能解释清楚一点？我们没有完全理解。

我举一个小例子，北京市人口学会的教授在人口普查中发现了一个案例，一个老太太60岁，她的老伴死了，她要找一个新老伴结婚，她的儿子、儿媳妇，不到10岁的孙子都反对。这个老太太坚决冲破阻力结婚了，结婚当天，她的孙子给她送了一个礼盒，打开一看，里面写了一个祭奠死人的“奠”字，老太太受了刺激，当时就脑瘀血死掉了。

我想，这就是观念杀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孩子从哪里出来的？

我讲的是比较泛义的信号，不仅仅是同性恋，大人不说，性的事情从小就被隐讳了，是一个羞耻的事情。

我相信，童戈先生的书，如果让一个同性恋者看到，他认真的读了，他体会到童戈先生重新发现的真理了，他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坏人了，他对自己的人格，自己的生存状态，都会形成正常的评价了，他就达到一种自我解放了，他也就让自己走进自由王国了。

张洪波：我是安徽医科大学公共信息学院的，来自一个不是东也不是西的城市，以晚出早归的时间安排方式来参加这个会议。

我非常感谢纪安德给我参加这个会议的机会，我每次都是跟在雅琦后面学东西，已经历史悠久了。在2002年以前，我和纪安德没有缘，在2002年才建立起缘分。2002年我拜访了他们的热线工作室，有机会观摩了他们的热线服务，正好有一个晚上是他值班。后来我跟他讨教，怎么看一些问题。我那时候对这个领域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特别好奇。从那以后，我一直带着非常感激的心态和雅琦相处，因为他领着我到这个圈子里去看，告诉我应该注意什么，教我该做什么事。去年，我们做项目的时候，那个项目是做全国这个人群工作的总结，他又再次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对他们的工作系统调研了一下。所以，我对纪安德的工作还是有比较多的了解。我特别敬佩的一点就是，他们一直在走创造性的路，他们不是跟着别人后面去做，或者是前期很努力，而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停下来，就跟着别人去做了。他们不是，他们是一直领着大家做大家还没有做的事情。他们的这种开创性，纪安德在这个领域里的贡献，在于它的开拓与创新，一直在做开拓的事情。这些开拓性的工作是最难的，一直在经历探索的过程，付出了很多非常艰苦的，别人看不见的努力。所以，我说，纪安德的工作在我们国家，起到了非常大的开拓和引导作用。回过头来看，他们十年来做的很多事情都放在那儿，因为我不是圈内人，我从一个公共卫生工作者的角度，抱着一种感激的心情来谈纪安德的工作，因为，没有你们的开拓，我们做工作可能连这个领域都看不见。

关于童老师的著作，同样，让我最早看到这本著作的同样是雅琦。那天，我的运气特别好，雅琦偷偷摸摸地带了一堆书，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没有我的份，他打开送给别人的时候，让我碰了个正着，我苦苦哀求说给我一本吧。这样，我拿到了限量供应的那个“征求意见稿”。拿到的这个时刻我特别感激，我想，我一定要它读完，雅琦给了我这个机会，我



一定把它读完。

到要来参加这个会，还有1/5左右的内容没有读完，昨天晚上在火车上读完了。我的感受今天早上也和童老师交换了想法，他的这本书，还有上一本书，他的调查，从我的视角来读，它给大家展现了太多的问题，我问童老师，你把这些问题都揭开了，我们怎么办？

这些问题涉及到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性的，还有跟我们职业有关的公共卫生的。其他东西我都顾不上了，就公共卫生这个领域的东西，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样？所以我真的是特别郁闷。

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我来反思公共卫生的问题。在这么多年的公共卫生教育中，我们都是想着自己想做什么，很少去关注我们所生活的周围需要做什么。实际上，这跟我们传统文化中那种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大有关系，许多的事情，似乎不是学者所做的事情。实际上，这个观念在今天，我们要换一个视角，童老师的这本书把我们挤到了另一个视角。在公共卫生领域，以这样一个人群为对象的公共卫生工作，更应该到实际生活中去发现问题，去发现哪些问题是我们要关注的，然后去解决问题。

童老师一下子给我们把所有的问题都摊开了，好象是说，你们自己看吧，你们能做点什么？这是童老师给我们的一个震动啊，他震动了我们，逼迫我们去看问题，想问题。他为我们开了一个头，找出了问题在这里，在那里，接下来，我们要花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找到我们能够做什么，怎么做。这些问题摆出来，涉及到那么多的领域，我们怎么从我们能做的事情中找到应对的策略、应对的方法，最终能够比较好的把自己学科领域内的问题解决。童老师给了我们启发，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很沉重的启发。

刚才雅琦说，我们对书的评价太高了，他有点不知道以后的方向是什么了。我倒是想，雅琦以后应该想着怎么带着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反正，你有童老师这个后盾，你也是我们的后盾。以上是我个人对第一本书的看法。

对第二本书，我并不知道内容，今天只听了郭先生的介绍。李银河去年提同性婚姻问题的时候，我就和异性婚姻做比较，我大概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来思考，思考以后，我举双手赞成。

为什么赞成？我是从我的角度考虑，我不是从人群角度考虑。如果从公共卫生的角度讲，如果同性婚姻有一个法律地位，可能会对维护单一的性关系起一个促进作用。现在我们说，我已经结过婚了，婚姻的法律地位会约束我，如果没有这种婚姻的法律地位来约束我，我的行为可

能会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法律的问题，可以成为社会认识的导向。比如歧视，现在歧视太多了。我们在安徽搞了一个江淮同心工作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骨干，春节回家的时候，他叔叔在网上看到了他留下了真实姓名的一篇文章，然后就跟他父母说了。结果，父亲是强硬派，一定要武力解决这个问题。母亲完全是哭哭啼啼，“儿子，你怎么回报我们老爹老娘的养育之恩？你不成家怎么回报我们？我们的脸往哪儿放？怎么出去见人？”父亲就是拳头，母亲就是哭。过完春节以后，和他同居两年的男朋友来找我说，他的精神不正常了。我把他带到精神科的一个朋友那儿去看，结果他被逼成了狂燥性精神病。

我非常同意刚才说的观点，观念可以杀人，歧视是杀人不见血的。我们的观念里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东西，许多事情，你可以做，但不可能说出来，不说就不存在。比如“同志”人群，这么多年没有人去说，大家都装做不知道，不知道就不存在。童老师把问题揭开了，不是揭开的时候才有，而是原来都有的，只不过大家装得看不见。性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这种观念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在这里吆喝一下，开几次会就能解决的。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法律的改革，法律的支持，可能会引导整个社会的歧视观念有一个转轨。没有这些转轨，我们很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很多事情是没办法做的。

我从2002年开始跟着雅琦做公共卫生领域的相关工作以后，觉得特别辛苦。你要和周边所有人打架，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就跟我讲：“那么多正常人的工作还没做好，你还去做这些不正常人的工作？”我们要和同事打，还要和老百姓打，老百姓说，你们在纵容同性恋，为虎作伥。我们还要做圈内人的工作，因为他们不认同我们，所以还得让他们来信任我们。还有，尤其是我们不太了解圈内的亚文化的东西，还得学着做，所以我觉得特别困难。

所以，我对郭先生的希望也比较高，希望努力促进法律层次可以有一个重大突破。

郑煌（上海乐宜机构负责人）：我今天十分感谢纪安德咨询中心邀请我来参加他们的年会。我想我是跟今天发言的主题关系最密切的组织，因为我们是做男性性工作者安全方面的组织。雅琦跟我说他们有个会议，可能是关于男性性工作者状况调查的研讨会，我就说我一定要参加，他也说很欢迎我。他说欢迎我，我特别高兴。



首先祝贺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成立十周年，一个组织成立十周年的时间，确实很难得，这里面有多少辛酸，大家一定都很了解。因为我很有幸拿到了童戈先生写的这部书和郭晓飞博士的论文的复印本。童先生的书从性工作者的行为、职业、社会关系和社会性别几个方面，多方面进行了访谈，做了很详细的详谈，也做了很权威的分析。以我做实际工作的观点，他的分析确实很权威。他发现了男性性工作者的问题，遇到的一些问题，揭示了很多现实问题，作为我们机构也希望多看到这些现实问题，不希望看到更多的浮的东西。所以我认为，这本书的内容非常重要。

还有一点我们很认同，童戈先生也说了，他是从一个平等的角度，我们也都认可这个原则，就是要平等，这个平等不是说说就可以的，而是从心里发出的，在你和对方交流的时候，那种歧视是一点都不能有的，否则你的访谈是进行不下去的。这点很重要，我们和童戈先生有同感，这对于今后我们做一些访谈，做一些工作，也是很有帮助的。

关于郭晓飞博士的书，我和他也是比较好的朋友，我从其他的途径搜索到这本书，在之前有幸先睹为快了。其中引用了很多典籍作为引线，也对古今中外很多法律做了评价，我希望大家都去买他的书。

我给童老师提个意见。童老师这本书，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缺少了对上海的调查，因为上海是个很大的市场，应该也会体现不同的内容，我希望如果再有这种机会的话，地域性能够更广一些。

还有，男男性交易实际上涉及到了女性的行为，书中只讲了男性顾客，其实有时候男性性工作者也会服务于一些女客，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把这方面的调查加进去，会更完美。我看到调查的顾客里只是讲的男顾客，其实MB还服务于一些女客，对他们的调查也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空白，如果以后把这方面的内容填补上会更完美。

吴涛（郑州公益先锋工作组负责人）：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这个年会，我谈的体会是，2006年8月份，中国艾协和纪安德在郑州的培训会，童老师去了，童老师搞调查，我帮童老师动员MB接受调查。我很有感触的就是，童老师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不是在写字，其实是用心血，用眼泪在写，真的。有一个叫“翠花”的，他又作演艺，又作MB。童老师到了我们这儿，我把一个叫“翠花”的推荐给他，当时是晚上10点。有一点，可能很少有人知道，童老师的房间里，给MB准备的水果、饮料、茶水，统统放在一个桌子上，为什么童老师做访谈做得这么好，他是把MB当成他的客人。还说这个“翠花”，等到我第二天早上9点钟去的时候，他8点40

刚走，才走了20多分钟。童老师和他从晚上10点多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8点40，一夜没有睡。他把自己的所有事情，在某一个地方、怎么偷别人的东西，怎么敲诈别人，说得那么详细。

第三天，培训结束以后，雅琦和安老师、童老师，我们一起去酒吧去，位子已经安排好了。但是，童老师没有往那个位子上坐，童老师也没有叫我，他直接跑到后台，我马上就跟过去了。翠花一见到童老师，反复说，“童老师，你这么大人物还来看我，我算啥，你来看我。”那天，主持人都已经说演出结束了，但他把主持人拉开，非要给童老师唱一首歌。准备音乐的时候，他的脸背对观众，这时候激动得全身在颤抖，转过脸来唱歌的时候，满脸泪水。

童老师做的工作，是用心在做，我是亲临现场的，我有这个感受。当时，有一个妈妈桑，他听到童老师是怎么和MB访谈的以后，他就提出，我能不能和童老师谈一下？我说，你这个课题童老师不做，再说童老师一夜没有睡了。当时我想，童老师年纪大了，需要休息。当时这个妈妈桑就很生气，他说，就给我一个小时，让我见到童老师行不行。我和童老师说了以后，童老师说不可以拒绝人家。他见到童老师以后，把自己从小的经历全谈出来了，把怎么开始做妈妈桑，到做了妈妈桑以后带着小孩儿的感受，都说了。

所以，我能体会说，童老师这本书是用心在写，用泪在写。

还有一个MB，童老师也说我，你不应该用那种态度对待人家。有一个MB，我叫他来，本来头天都约好了，第二天他却在电话里面问，童老师玩儿不玩儿？给钱不给钱？当时我觉得很没面子，用了很激烈的话骂他，你不要自己的人格，但不允许你侮辱童老师。童老师立刻说我，不要这样，人家关心自己应该关心的问题，没有错。童老师让我告诉他，童老师不玩儿，童老师给钱，因为童老师希望你能尊重童老师，当作朋友来谈。那个MB的访谈也谈得非常好。

在郑州的案例，都是童老师用自己的心灵，用自己的人格写出来的。

蒋宁：我来自全球基金第五轮艾滋病项目办，我很高兴有参加这个研讨会的机会。我们项目从去年7月份启动以来，就得到了UNAIDS、WHO、中英项目、盖普项目的支持。参加这个研讨会，上午也听到了很多专家和老师的介绍与讨论，我有几个想法与大家交流一下。

这两部学术专著是属于社会学的研究果，非常有意义。为什么这么



说呢？虽然我自己是学预防医学出身，学公卫，我也是公共卫生工作者，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社会的发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就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大发明。实际就是个人以出资的部分负有限责任，而公司对外负无限责任。社会科学领域这样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的社会发展起的作用非常巨大。我们一直在说，艾滋病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对于这样的社会问题，我们必须要用社会科学的研究的思路和工作方法来提供解决这个问题的策略和技术支持，这样是符合实际的。因为我们卫生人员的视角还是比较狭窄，比较有局限性，用我们专业的知识来指导这样一个社会性疾病问题的防治，非常不足。所以，在今后应该呼吁更多的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来参与这方面的研究，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我们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实际中去，这样对我们的工作会更有促进。

童戈老师和郭博士的书我还没有仔细读。这样的巨著，我们的领导可能没时间看，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编辑出一个精华本，把各种关键问题提炼出来，提供给我们的政策决定者，这样对我们的工作更有帮助。我听说，纪安德在WHO支持下，正在做一个行为干预实施指南。我想，今后怎样把童老师这样的学术研究成果和艾滋病干预工作结合起来，就像刚才张洪波老师提的，问题摆出来了，但是怎么解决？我们从哪个角度着手？这也是我感觉我们公共卫生工作者能力非常有限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像纪安德咨询中心这样的机构和我们更紧密地合作。这也是我提的一点小小的希望，谢谢大家。

常天乐：我来自中国发展简报的英文刊。来之前听说了这本《中国视野下的同性恋》，所以我是带着问题来的。但因为没看到书，光听您的介绍，很多问题还是需要问。我看了一下，这本书非常像学术的东西，从历史、法律的沿革和现在的法律修改来讲同性恋。童戈老师的调查报告里也有一章专门讲社会法律框架下面男男性交易的问题，童老师提出了“执法贪渎”这个严重的问题，我读了很震撼。我想问一下郭博士，就是在法律和执法的实践中，对同性恋或男男性交易，这是存在很多矛盾的，有很多NGO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执法的问题是不是在郭晓飞博士的研究范围里面，就是执法的问题，以及中国不同的法律和地方法规之间可能存在矛盾的问题，会对这个群体造成什么影响？

第二，我们现在有那么多关注同性恋的NGO组织，有政府的、有非

政府的，他们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以及他们工作的合法性，这个，是不是也在你的研究范围之内？因为童老师的书里给了我们很多很具体的例子，比如警察怎么滥用权力，而那一章给我的感觉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探讨，而不是站在法律专业人士的角度去看，我希望能听到郭博士的意见。还有，你对于中国立法，从立法推荐的角度有什么见解？

最后，我想说一下童老师这本书，作为一个记者，我特别高兴看到其中有提到“媒体霸权”和“学术霸权”的问题。就我看到的材料，这么直接的揭示这个问题的，实在不多。大家在做采访、调研的时候，如何能够跟采访对象、调查对象平等地、互相尊重地进行沟通？犯罪嫌疑人对警察和法官的审问，还有个合法权益的保障问题，记者和学者，怎么去尊重人家的合法权益？我非常高兴看到您在这本书里把这个问题非常直接地写出来了，而且是通过当事人的实际情况揭示着这个问题，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触动，谢谢。

郭晓飞：刚才谈到学术论文非常学术化，可是它是博士论文，没有办法不学术化。平常我们和雅琦聊、跟很多老师聊，都可以聊得很愉快，有很多生活中的材料，但是作为学术，肯定有它的规范，包括每章下面都是密密麻麻的注，包括中文的、英文的、古文的，有时候可能会觉得烦琐，但这是好事，因为国内外所有研究同性恋有关材料都会在这里出现，承认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取得发展，这很重要。

关于执法的问题，在我的书里有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对书本中的法和生活中的法，进行比较。你刚才提到的关于警察执法的问题，像这类的问题肯定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我没有把它纳入进来，但是我研究了很多案例，如同性强奸，离婚时的损害赔偿，我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揭示主流价值在面对同性恋身份出现的时候的尴尬，书里有很多近年来出现的鲜活案例。

翁乃群：首先我要感谢邀请我来参加这个会，实际上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首先当然是感谢纪安德，也祝贺纪安德的活动进行了十周年的纪念。

童老师的这两本书，最初的征求意见稿我都翻过，但是读的不是很认真，太厚了，可是给我的印象很深，确实是非常出色的学术研究成果。无论是从应用性角度还是从学术性角度，它的意义都是非常大的，因为它确实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我们国家这个社会里的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



状况，并且就是在同性恋内部，也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存在状态。完成这样的课题，形成这样的成果，这是很不容易的东西。因为，我们在谈论一个群体的时候，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往往都是同质化，就是中国人、外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光有一张皮，但没有骨、没有肉，没有那些更多的实实在在的东西。童老师的这两本研究报告，确实是一个有骨、有肉的东西，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深入，而且是多元的途径，而且这个途径还是放到中国当代的情景下来谈这么多的问题。这也是从我的专业学科，人类学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研究，尤其是在当代，往往是只有皮，没有骨头、没有肉，没有活生生的人，但是我们看到童老师这两本研究中是活生生的人，从应用的角度，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基本的、深入的资料，使我们所有的应用计划可以有一个扎实的基础。因为我们的很多艾滋病防治项目，是基于一个非常同质化的框架下去制定的，这就是当前我们很多艾滋病防治领域中最大最大的问题。

另外，从学术角度来说，同样的一个社会现象，按我们的学术行话来说，我们可以从主位来看，也可以从客位来看。而童老师的研究，更多的是从主位来谈这个问题，但是也并不完全是主位，因为童老师有自己受到其他的文化和学术方面的影响，所以他的研究表现着一个主客位的对话，他的研究是用这样的对话进行的。我觉得，这是童老师的一个学术风格，这个风格很鲜明。从整个学术意义来说，这样的研究风格很有意思。我没有做过同性恋研究，但是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特别多。确实，在同性恋群体里，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在同样的同性恋群体中，它也是多元的，因为他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都有一个不同的社会情境，在应用上，也会产生一个我们怎么做应用的问题，但是，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扎实的、深入的研究过程。童老师的研究本身，也为我们其他群体的研究具有示范性意义。

因为，从艾滋病防治角度说，我们知道，还有因为卖血的、因为吸毒的、因为是女性性工作者传播的群体背景，都应该有这样很深入的研究，才能够形成有针对性的、更有效的防治措施。当然，实际上，这个研究不仅仅是停留在仅仅为了非常公益的艾滋病防治角度上，它有更大、更广的社会意义在其中。当然，学术界可能还没有看到这两本书，但实际上对学术界也是一个冲击。

童老师的书，活生生地表现出艾滋病防治工作，或者说艾滋病的传播在中国、在全世界都不是一个生理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社会文化的问题。大家都会这样说，但往往缺乏一些真实的、活生生的例子，或者说

依据。童老师的研究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东西，把这些问题活生生的展现在你面前，

关于郭晓飞的研究，我还没有机会读到这本书，我希望以后有机会。根据你刚才的介绍，我很同意李楯老师和前面几位专家的讲话，我认为，你的研究，从学术上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博士论文，非常深入，分析很到位，其中也揭示了很多问题。你举的一个例子，可能是跟雅琦的对话，就是说男男同性恋者有没有与异性结婚的权利。我从学术角度来说，这实际上关系到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就是任何社会关于人的观念，什么是人，用到社会性别角度来说，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不同的社会文化有不同的概念，在中国的文化里，男人其中就包括要生儿育女，男人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而是你要怎么去实践，去成为一个被社会认可的男子。从这个意义来说，你提到的一些东西也给我一些这方面的启发。

下一步，任何研究，尤其是童戈老师和郭晓飞的研究，最终要落实到应用，这些东西，一方面是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具体应用，另一方面，如果按社会人文研究，任何人的社会都是一个伦理社会，不是一个生物社会，按人类学的说法，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伦理社会。所以，这些东西对认识我们这个社会，从方方面面推进我们这个社会的变化和进步，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促进。从这个意义来说，这些研究应该要去强调，或者进一步使更多的人了解，并且能够使它转化为一种应用研究的最基础的、最基本的材料。

高燕宁：我在这种场合说话特别困难，因为我老在说自己一知半解的事情，我也不怕你们批评，先说吧，说得不对你们再指正。

童老师的两本书在初稿的时候已经拜读过了。我感觉，童老师的很多东西，思想的东西，是在第二本书释放出来，而不是第一本，所以感觉读第二本的时候更顺，第一本书中，一些问题的提出，一些观点，有横空出世的感觉，但是第二本书已经看不到了。第二本书的东西实际是第一本书的释放和升华，实际上你是借第一本书的思考来写第二本书，我的这点感觉比较明显。

我很欣赏童老师在这本书上应用的很多术语。我感觉，他在学术研究上面已经是心有余力了，包括在文字上可以写得很从容。所以我说第二本书的文风更大度、更从容。他在书上用了“很艰涩的历程”，这个词用得特别贴切，他在讲到社会学领域的时候用了“观照”这个词，我想怎么会用这个词？还特别跟他探讨了。我想，他确实给了我们一种全新的视



角。这是读书的感觉。

这两本书，这么丰富的案例，这么丰富的情景，这些事实的背后到底揭示了什么？这个问题应该是潘教授来谈的，而不是我来谈，所以最后还得请潘教授来谈。它到底揭示了什么？确实揭示了很多东西。我在来的火车上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到今天才来谈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其实早就存在了，为什么我们要等童戈来揭示？我在想，中国到底经历过文艺复兴没有？如果说这个思路是对的话，那我们确实应该从文艺复兴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社会到底走到哪一步了。这是比较前期的感觉。

下面说一些我自己的经历。今天的主题就是MB，我先说个插曲，2005年，当时复旦的孙中欣教授开了同性恋研究的课，我们这里也开了一个健康社会科学的课，当时两边都请了MB过来给学生上课。其实两边都联系好了，是自行联系的MB。孙老师左想右想，还是不想让MB上本科生的讲堂。所以那个MB没有去本科生的课堂。当时，我们这门课是另外一个老师梁季在主持，他问我这门课要不要上。我说当然要上了，如果出了问题来找我。说是这么说，我的口气是很大的，而那个MB也讲得很好，实际上他讲完以后，我一直送他出去，一直看到他打车走了，我自己想“好象是没事儿了”，我自己说出的大话才划上句号。这是个插曲。我想说明什么呢？当时的MB研究，是请澳门大学社会学系的charlis·kon（音）博士来讲的，他也讲得很好，他的研究是偏向于定量的，我这次来的时候本来是想把他的研究跟童老师的研究做一下比较来谈，他给了我一本书，但我没有找到，所以这个任务没法完成。但是我听过他的课，2005年他也做了不少研究。

我在想，如果我们的研究，就像MB这样的研究，童老师更偏重于本土化，kon博士更偏向于一个国际化的视角，童老师更偏向于中西方中的“中”，他更偏重于中西方中的“西”，同一个研究，用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对这样问题的认识一定会更丰厚、更精彩，也一定会更全面。这两个视角都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缺任何一个视角。我们原来没有本土化的视角，童老师把这个很重要的视角给我们补上了。

从MB的研究来说，如果把Kon的研究和童老师的研究做一个比较，里面肯定会有一些有意义的发现，你会发现研究者对视角、思路、提问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是很有意义的。其实我还有个建议，把童老师的MB研究跟潘教授的小姐研究如果再比较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从性产业的角度值得比较的地方。我是做不了，有人要做的话，肯定能够得到很有意义的发现。今天我请教童老师，为什么MB里面也用到妈妈桑这个词，到

底是因为MB性产业发育不成熟借用过来的，还是这个称谓对这个社群就有它的亲和力。无论是从小姐、性产业的角度，还是从社会性别学的角度，我想还有很多我们值得研究的地方。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

第二个体会，我读到童老师这本书的时候，当然童老师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他个人的投入是很大的。翁老师刚才说的，童老师的研究是一个主客位的对话。因为我听过童老师的课，童老师的许多基本理念，我能在本书中找出他的脉络来。其中的一个脉络，童老师在书中谈到平等，他一直坚持着是从多样性的角度，从尊重多元的角度谈平等。

谈到平等，这个特别巧。我去年12月上旬到日内瓦开会的时候，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开一个会，会议名称就叫做“把社会性别纳入卫生专业课程”，我把复旦开课写成了案例投到他那里去，也被他们列入全球八个案例之一。

到了会议上，我才知道根本没有我发言的权利。到了会议我才知道，会议的很多议题，说老实话，他们谈性别平等，只是男女平等。我听了半天没有吱声，到了下午，我觉得不行，我一定要说，我就吱声了。我说性别平等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还应该谈谈性别的多样性，而且我认为性别的多样性跟性别平等应该是互相支持的，应该让它们走到一起。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在会场上抬眼一看，会议代表中五分之四是女的，三分之一是黑人或者是穆斯林。

我觉得，如果我们缺乏了多样性的视角来谈平等，其实这个平等很多时候是很空洞的。这个问题，我跟李文晶老师也交流过，李文晶老师认为，如果说性别平等，我们对性别问题只谈了一半。因为我在童老师的书中也读到了这个感觉，他谈平等，首先强调尊重多样性，所以我把这个感觉告诉大家。

这是我当时在日内瓦会上谈的一个东西，就是性别的多样性。

会议的另外一个主题是性别敏感性。我说，没错，性别敏感性我们要谈，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应该谈学科的敏感性。比如说公共卫生的敏感性，如果做公共卫生的人没有自己发自内心的欲望要参与到性别问题里面去，我们的参与肯定是很被动的。我就谈了一个课程的全球视角，我其实说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你可以开成选修课，也可以开成必修课，可以开成研究生课，也可以开成本科课，也可以在教室开，可以在网上开，等等。我就想说一句话，除了谈男女平等，我们还应该谈比男女平等更多一点的东西。我当时在会上怕被别人群起而攻之，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谈。这是我的第二个体会。

第三个体会，谈到童戈老师接连完成的研究，今天大家都给予了很高



的评价，大家也很公认这样的研究成果。我就想，我们就来看看，这样的研究成果为什么不出在我们的高校？为什么不出在我们的学院派？为什么由纪安德请童戈来做就做到了？……其实，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如果展开下去，会有好多可谈的。我本人的观点，高考已经把我们的民族的教育做了第一轮的功利化，现在大学里面的竞争体制又把中国的教育做了第二轮的功利化，其实我们做学术的很基本的东西，在这两大轮的功利化面前已经支离破碎了。比如说公卫学院，今天在座的就是我和张洪波老师，我们谈公共卫生教育的时候很有同感，也很痛苦，我们要回答什么问题呢？就说公卫学院，中国发生了那么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我们那些公共卫生的教授们、院士们仍然躲在实验室里面绣花做文章。你说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谈？这个问题我们谈不起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既然公卫学院做不了，既然高等院校做不了，既然纪安德和童戈做了，而且这么成功，我们就有机会可能让中国学术从另外一个生长点来生长起来。

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

曹宁校（中国CDC性病控制中心）：我衷心的祝贺纪安德十年的发展，这十年来，纪安德对我们做这个领域工作的人，几乎成了知识支持的支撑。

我和雅琦认识到现在，我个人觉得我的收获一直是在不断的增长。

从今天看到的这两个报告，先说郭博士的。我注意到他把南京发生的同性组织卖淫案件很正面地做了一个剖析。这么长时间没有人很好地应对，这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分析。因为这个事情的出现，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当中，是值得去关注和分析的。因为，从这件事情开始，我们的法律开始关注这一块。这个问题发生以后，不管是好是坏，我发现媒体有些视角在发生变化，不是只知道批判性交易，而是揭示着我们法律本身的不足。

童老师的这部《中国男男性交易状态调查》，对我来说很及时。我和童老师交流的时候，正好在南京有一个我们举办的MSM性病服务的研讨班。我在这个研讨班上很幸运的向雅琦要了一本征求意见稿。我很认真的读了这本征求意见稿，从里面，我得到了很多的收获。第一，在一些概念上，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澄清，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本书前面对一些概念的解释。我在2000年、2001年的时候，就听张北川教授提出了“自我认同”这个概念，但是，后来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初提出的“自我认同”概念带来的一些问题，我们仍然没有办法解决。2002年，我有一次在上海做

培训，我在讲到“自我认同”的时候，不得不在后面缀了一个“尾巴”，说还有一个社会角度的认同问题，这就成了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也没有办法交待清楚这个概念。你既要承认你是同性恋，又要适应社会，但是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很难说。我后来拿到“征求意见稿”的时候发现，童老师在这方面给了一个跨越以往的理解，非常实际，也非常清晰，非常确切的定义。

如果，现在我再谈“自我认同”的时候，我想我能够谈得很清楚。

另外，从童老师在2004年完成的《MSM人群艾滋病预防行为干预方法研究》到去年完成的《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再到现在的这个调查报告，一步一步，我们看到童先生象是在不断的攀登着一座险峰。我说的不是他写了多少字，多少案例，而是他的思想在不断的升华。正像高老师说的，如果那本蓝皮书还让对很多突如其来的东西有一些很生涩的感觉，但到了这本书，思路非常清楚，观点非常有条理，对于你要做的工作，不仅是冲击，包括对而且会影响到你的工作思路。

我今年幸运的获得了一个社会动员项目橐MB的干预。我开始的设计完完全全是按照原来的设想。看完那本“征求意见稿”，我给童老师打电话说：“童先生，你完完全全把我的想法pass掉了，我完全死掉了，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因为，我们很多过去主观的认为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这个社区里面却完全不一样。看了童先生的报告，我不得不重新调整思路，到现在，我的思路还在调整。

从我们看到的这些案例中会发现，每个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一些价值选择，包括一些生活选择，都有着他自己自身的、社会的复杂原因。这些问题和我们做艾滋病干预很有关系。我们不能认真的从干预对象的角度考虑思考他们的接受问题，我们做的永远是空中楼阁，只能说是做表不做里，我们做不到里。

童戈：应该说曹大夫也是帮我做调查的干将之一。西安的安然在这儿，我提议安然说一说，他是怎么帮我做调查，帮我找到调查方法路子的。

安然（西安工作组负责人，全球基金项目技术顾问）：童老师到西安去做MB项目调查的时候，调查前期的准备，调查对象的组织，基本是由我来做的。那十来天，我跟童老师天天在一起做这个工作。童老师去西安之前已经跑过了几个城市，但是我感觉当时他的精神状态特别不



好，心情特别不好，整个人都显得恍恍惚惚的，非常沉默。因为他一直没有摸索到能够没有距离的和 MB 交流或者说是交心的有效方法。在西安的时候，他为这件事情特别焦虑，我们俩晚上有时候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他一句话也不说。

因为我在西安开展社群组织的工作比较早，包括在 MB 人群里，工作基础比较好，所以组织这样的访谈相对比较方便一些，有利条件多一些。在西安的时候，也是通过跟妈妈桑，先请妈妈桑组织若干个 MB，我们坐在一起，以座谈会的方式交流，从中发现愿意交流的 MB，再深入交流。这样才摸索出一个方式。

刚开始的时候，还想不说童老师的身份，但没法隐瞒，因为一说，别人就知道他是童戈。

童戈：他们听说童戈到西安了。

安然：对，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最后在西安摸索出一种方式，我感觉那种方式就是既要强调专家的身份，说明专家是要做一件什么事，而在调查过程中，又要彻底放下专家的架子，能够完全用一种朋友之间的，或者说是两个 gay 之间的交流、交心，非常近距离、亲切的氛围，在这样的环境下做这样的交流。刚才郑州的吴涛也讲了，童老师跟 MB 之间的交流，有时候持续五六个小时。坦率的讲，我没有那个精力，但我还要保护童老师的安全，我一般到晚上 2 点钟左右的时候走，第二天早上我 11 点到宾馆去，经常是被访谈对象离开宾馆了，而童老师从早晨就整理访谈记录了。

我们跟 MB 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是流着眼泪在作交流，作记录。后来我和童老师若干次坐在一块儿谈到一些 MB 时又抹眼泪。并不是说他们个人的经历多么悲惨，我们不是为了这个流泪，而是为有些 MB 对我们的那种坦白、尊重在感动。我们被 MB 感动，他们也被我们感动，有的 MB 主动帮助童老师动员别的 MB 来和童老师谈心。

童老师的调查这么成功，我觉得，也就因为这是童老师在做这件事，童老师接人待物的素质，他拿 MB 真正当成自己的客人，他在交流中还骂小孩，可小孩还是把他当成知心长者，愿意把心里话说给他。

作为 MB 来讲，童老师从学术的层面上，第一次把它摊在桌子上，让大家来看、来了解，来关注这么一个人群。

过去，我们说 gay 人群非常像黑社会，现在 MB 人群更像黑社会，所有的活动都是在地下的，没有人去关注他们。可以说遗憾的是，最后来关注这个人群的还是 gay 本身，这是挺遗憾的，但也是挺自豪的事，我们是第一次自己人来关注自己人，并且产生了我们自己的专家。

再一个，跟MB的交流，所有关注这个人群的，包括关注MSM人群的专家和学者，只要你真诚的用心去关心他，他也会给你非常真诚的回报。拿我个人来讲，我从1998年开始介入到这个工作里面来，日常工作当中接触了很多的MB，我刚才还接到一个MB的电话，是我在另外一个城市认识的，他说：“哥哥，我离开这个城市了，换了阵地了。”他告诉我，他到了新的地方，我们建立了非常非常信任的关系。

我个人感觉，你真诚的关心MB，就别把他当成MB，就当成普通的人，我个人觉得他就是一个职业，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再一个，刚才各位专家都对童老师的这本书在学术的角度给了很高的评价。说真的，从性学方面也好，从法律学方面也好，我都是个外行，我原来是搞媒体出身的，我不能在学术上给更多的评价，但是我很“GAY本位”，我看见人群出现了自己的专家，有这样的学术成就，我特别的高兴，也特别的自豪。

具体到MB这个领域，过去我们主要是在健康干预这一块做工作，我没有考虑的更多，后来协助童老师搞这个项目以后，考虑的就多了。我想，对MB学术层面的研究，怎么样从一个学术成果转化社会效益，通过学术成果影响政府和社会，包括影响几十年来一直比较顽固的中国媒体，在社会上倡导一种不单纯是针对MB，也可以包括所有性工作者在内的人文关怀。童老师提出了这样的倡导，我觉得这种关怀是特别需要的。

还有一个层面，对嫖客，我说的嫖客指的是男男性交易的嫖客，我们在做访谈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的嫖客行为，在我看来，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变态的，或者说给他提供性服务的人来讲，是对这些人造成伤害的。所以，怎么样在嫖客性消费的过程当中倡导一种文明的消费，我这些考虑都不成熟，我不是性学专家，我就想，怎么样不给你提供性服务的对象带来伤害，这个问题应该加以关注。

还有一层意思，在他不作MB的时候，我们应该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有效渠道、一种方式，给作MB的人提供心理帮助。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没有这么一个心理帮助的过程，他做MB的阶段留下的心理伤害，甚至反社会的情绪，那种情结，可能会持续一生。因为我在跟MB接触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不是gay的MB，对消费的客人非常仇视，这边拿钱的时候他们哥啊、叔啊的叫，钱一接过来，马上就骂娘，骂他们变态，他为他提供了性服务还骂他，这种事很普遍。所以，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心理帮助。

我的这些想法都不成熟，只是参与到童老师做的这个项目以后，产生的一些想法，仅供大家参考，谢谢各位。



王珺（成都同乐健康咨询中心）：我也是童老师的学生，我今天结合我学习童老师头一本书，简单的谈一些心得。

我先说一下郭晓飞的书，信息量少一些，我会说的简短一些。

我不相信会有立场绝对客观的研究者，我总觉得，一个研究者总是带着自己的一定程度的潜意识寻找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虽然郭晓飞涉及的是跟同志的法律问题相关的方方面面，但是他对同志间的强奸比较关注。

郭晓飞：在里面只占很小的比例，只是拿它说别的事情。但是我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同志运动和女权运动比较，对强奸问题更不敏感。为什么女性主义运动对强奸很敏感，为什么同志运动对强奸不敏感，大家可以分析这里面的社会性别因素，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王珺：我觉得晓飞的研究是用开创性的、比较全新的视角看了法视野下的同性恋问题。我们不能把同性恋的生活看成一锅粥，全部搅在一块，实际上每个问题都可以深入挖掘。三大块，一个是婚姻问题，一个是强奸的问题，一个是卖淫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单独做的话，都是很好的题材，都可以做出很多的东西。现在你把它全部做了，确实很好，相互之间有一个联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肯定还有一些东西没有深入。我希望晓飞不要在这个地方停步，希望你把每一个部分再更深入的挖掘。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生活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现在同志的生活不受法律保护，我们希望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来保护我们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以晓飞为代表的一代同志问题法学家的历史责任。

我们很多的同志都去研究异性恋，可能大家不知道，童老师以前是研究异性恋的，而且著作等身，出版过一百几十万字的专著。他终于在50岁的时候研究自己人，这也有社会的原因，就是不许他研究，他还是要冲出来，压不住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来研究自己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规划自己的生活呢？

我看了童老师新完成的这本书，刚才大家也都提到，我们怎么来用这本书。这还是有一个视角的问题，刚才提到传播一个人就是解放一个人，实际上这还是值得商榷的。大家对信息的接收和解读还是不一样的，根据自己的身份，包括自己的性别、性取向，甚至包括自己的阶级，接受同样的信息，可能解读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现有的干预方式，还是异性恋视角的干预方式。希望大家能够从这本书中读出一个同性恋的视角方式。很多的干预方式都是说，你的生活居然是这样的？你赶快改过来。而在这本书上，我们看到很多，他的生活方式就是

这样，他需要的是什么呢？是服务。我们应该在哪些点上给他什么样的服务，通过服务促进他更健康。

我觉得，我们不要把里面的案例仅仅当成案例来看。童老师也绝对不是再给我们讲故事，这些案例，都内涵着丰富的、深刻的人的意义，社会的意义，人与人在社会中怎么交往，怎么活着的意义。我们要从里面看到它是人的多元生存模式，他们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今天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在这一刻他需要的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怎么通过很好的体系去提供给他。

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哪几个部门就能够解决的，是一个艰巨的社会工程。我们可能要用一代人的时间来堆积我们一小步的社会进步。我们怎么来利用这些东西？童老师的两个研究，信息非常丰富，很多的东西，我们确实实现在就可以做，虽然做的是很小的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从这点来找，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些什么事？

我真的非常感谢童老师又给了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工具，这对于我们下一步的工作的指导性非常大。谢谢大家。

李扁：刚才复旦大学的高教授提了一个词叫“文艺复兴”，我觉得我们正是刚开始这个过程，包括童戈老师讲到，他访谈的时候一再降低自己的身份，最后人家才会跟他交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壳和核的东西，社会给了我们太多的“壳”，童戈老师一步一步放低自己的过程，就是一个脱掉这些“壳”去发现“核”的过程。我谈的意义比较泛，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专家从国外回来了，他是中国性学会的实际创始人，是世界华人医学家心理学家联合会的理事长，他带回来一个消息，说世界性学会改名了，改成世界性健康学会，他觉得特别不可理解。我说这个事情很好理解，因为在世界上，像法国经过启蒙运动以后，解决了人是什么东西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性学会可能不像我们在中国一样，他们认为性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的问题。而在中国，我们没有经历“文艺复兴”，我们对性给予了很高的期待，希望把性当成一种革命的力量。也这么主张，性就是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一条道路。

比方说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课题，上次启动仪式的时候，我让潘绥铭老师去，他不去，为什么呢？他说你搞了太多的领导来了，有太多当官的人来了，他不喜欢这样的场合。但是没有办法，中国的资源99%都是官员掌握着，自己想做点事情太难了，必须得借用他们。



我们以做课题的方式，借艾滋病为题，做了性健康教育，中国青少年艾滋病防治教育工程。……我觉得，做艾滋病这个领域的事情，目前很重要，艾滋病问题从根本上说不是性的问题，或者说绝大部分不是性的问题，它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是社会不公平的问题。

郭雅琦：谢谢各位专家、老师对我们的帮助。潘绥铭教授是我们学术支持的靠山，最后请潘教授给我们做一个总结，算作我们这次会议的闭幕式。

潘绥铭：首先没给我安排，我也总结不了。我只是想提出一些问题，咱们再进一步往下不断的思考。

我们类比于妇女解放运动，类比于妇女研究，同性恋研究，包括MB研究，可能，我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比较荒谬，但是，现在需要我们想想这个问题了——我们是要研究同性恋？还是同性恋自己研究自己？还是我们为了同性恋来做研究？我们是要做什么呢？

在座的很多都是“同志”，我是个异性恋，当然我存在这个问题，而同性恋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吗？一样的。虽然你是个同性恋，你是把它当成一个课题来研究？还是同性恋就要由同性恋者自己做研究，潘绥铭研究就不行，因为你是异性恋；还是我们是为了同性恋利益而研究呢？

这三个视角会得出三种完全不同的结果，说一句不好听的得罪人的话，艾滋病的问题，三个全不是，预防艾滋病，三个全不是。他们是吗？他们既不是同性恋自己的研究，也不是为了同性恋的利益而研究，也没把同性恋当做课题来研究。他们是为了另外一个事情，由另外一种力量来推动。

刚才一位代表的发言说到我想说的话，就是如果同性恋在中国可能是个问题，那么，异性恋是不是一个问题？同性恋到底因为什么成为了一个问题？艾滋病因为什么成为了一个问题？不知道，我们谁论证过？

知道童戈先生的书里面说了，越是高度职业化的，越是在妈妈桑领导下的MB，安全套的使用比例越高。那艾滋病怎么可能是个问题呢？这个问题是谁造出来的？谁灌输给我们的？谁告诉我们说同性恋那边有个艾滋病问题的？这都是别人给我们灌进来的，所以大家不管是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我们既然是一个圈子里面的人，就不得不想一下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建构起来，被谁为了什么利益建构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才能清醒的知道，我们该怎么面对目前的这些艾滋病项目。

大多数同志组织缺乏资源，这是谁都知道，谁都理解的，没有资源，

借着同性恋项目做一些，大家都知道。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不得不想这些问题，它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尤其是洋钱，西方来的钱，是不是想在中国推行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我不知道，也不敢下结论，但是有这种可能性。可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最仇恨的是谁？大家都知道，首先是同性恋，恨不得把所有的同性恋都烧死。所以，这样的东西会以一个非常善良的面目出现，历史上一切反人性的力量都曾经打着最善良的口号，为了公共卫生，为了大众健康，因此要把你烧死，历史上都曾经有过。

第二个问题，我们谈到，童戈老师作为一个草根学者，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研究成果。那么，我们也讨论一下，什么样的研究才能叫做学术？

刚才，大家的发言里面也有比较明显的倾向，对“学院派”不太感冒。我们研究所在我们的章程里面明明写着我们是学院派，我们要坚持学院派，所以，这个也要讨论一点，学院派和“草根派”吧，是不是在学术上必定要打架，必定分等级呢？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我想，这个跟妇女运动的起因是一样的，是不是妇女一解放，男人都是王八蛋，都该枪毙了？不是吧？而是要反对男人的霸权。“学院派”在过去历史上，由制度，由指导思想，形成了学术的霸权，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学院派”的学术标准有什么错，而是因为这个学术标准被霸权化了、被一统化了、被除此以外概不承认了，这是它的根本错误。就像妇女运动批判男权一样，不是男权这个物种或者这种生物有什么坏处，而是因为你建立起了一种专制政权。在中国男权社会就是皇权主义，以皇上为中心，这就坏了。所以，我们既要反对传统上“学院派”的霸权，但是又要坚持学术标准。

什么叫学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创造知识，一切工程技术人员，哪怕你当了总书记，你也是使用知识的人，仅此而已，而创造知识是我们最起码的任务。童老师的书之所以有学术价值是因为他创造了这些知识，不要说我们异性恋者不知道，很多同性恋者在他拿出他的研究成果之前，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丰富的内容，他为我们创造了一些知识。第二个层次，他创造了一些方法。怎么会创造一些方法？大家都知道，自然科学里面，一切进步都不来自于某个人的天才，来自于他找到了一种新的更适合的方法，否则你测量不出粒子来，否则你无法验证万有引力，你也根本破解不了哥德巴赫猜想。童老师的成就，刚才也有帮助他做调查工作的朋友讲了，他能拿出这样的调查报告，是他为了找到更合适的方法恍惚过，他最后找到了合适的方法。第三个层次，我们能够在认识论上推进一步，对你研究的事物，是用进步的认识，而不是用落后的认识。



符合这样的一些标准。不在于你写了多少，也不在于谁写的，也不在于是用诗写还是用电影写，还是用干涩的学术语言写，而是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三点，或者，在任一点上能够给人们提供一点新鲜的东西。谁做到了，哪怕你是用散文诗写的，好，你样为人类的知识总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传统社会里面把搞学术的人捧得很高，从孔子开始到现在的大学教授，脑袋上一大圈的光环，如何如何高，而你是做普及知识的，或者是使用知识的，就被贬得非常非常低。这两者根本没有高低之分，像过去有一句最老的老话，“分工不同”。有一部分人、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比较适合做学术的工作。我经常讲的一句话，“我除了干这个，别的干不了”，你让我做实际工作，我还真干不了，绝对不到三天就被老板解雇了，我只好做这个。

所以，我们做研究，还是要坚持这样一个学术标准。

第三个问题，在同性恋问题、在MB问题上，我们到底发现了什么呢？试图反映什么呢？我们现在的同性恋研究跟国际上有重大的不同，在中国的同性恋研究并不少，至少我检索到的也将近200篇了，区别在哪儿？我们仍然还局限在酷儿理论里，还仍然局限在一个身份和地位和权利的这条线上，或者说一条线上。这条线是最迫切的，对任何一个弱势群体来说都是最迫切的，可它又是最短平快的，很快会烟消云散。

郭晓飞的论文里也专门写了中国法律，中国的法律，在字面上怎么写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

MB当然非法，性产业当然非法，可是，全中国哪儿没有？我出了门马上可以找到几个小姐。所以法在纸上怎么写并不重要，而是你想在实际生活中改变实际存在的法，就不得不走向第二步。仅仅从身份和权利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就远远不够了，身份权利的角度，酷儿理论，你可以跟政府说，跟人大常委会说，跟法律起草者说，再往下，我们的朋友、亲戚、父母、老师，今天开会到座的有同性恋，有不是同性恋，我们互相之间怎么交流？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更现实的问题。任何一个异性恋者也不可能完全生活在异性恋社会中，同样，任何一个同性恋者也不可能完全生活在这一个圈子里，你肯定还会认识一些另外一个分类的人，这时候我们怎么办？这时候你靠身份、认同、权利是没法解决的。也就是说，建构主义的理论，从最根本的问题上，要逐渐扩展到人和人的关系。包括刚才童戈先生讲的。在不久前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相当多的朋友也非常看不起MB，非常排斥MB，这又为什么呢？

这大概和政府没有什么关系，不能说是政府教我们必须看不起MB。我们之间又该怎么相处？我们怎么构建相互之间的关系？对于同性恋圈子来说，首先建立跟异性恋社会的关系，这个毫无疑问，我从来不否认。但是很快我们又面临着最现实的问题，我们之间该怎么建立关系？

全社会的同性恋者都是无限丰富多彩的，组织最多，任何一个群体的组织也没有同性恋者的组织这么多。可是异性恋对同性恋的误解和歧视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你们天天乱七八糟，自个儿打自个儿，他不能理解。尤其在中国，异性恋世界相对来说比较整齐划一，所以他不能理解你这种多元存在。那么你这种多元存在怎么能够向别人说清楚呢？我们的同性恋群体，高到最高领导层、最高艺术层，低到MB，这么一个范围之内，又该怎么样呢？酷儿理论的出发点就在这儿，难道这些人都叫同性恋吗？难道用同性恋这个词把这些人都是可以涵盖进去吗？所以才提出了酷儿理论，这就是酷儿理论的背景。在中国，我们的实践，“性”的关系、实践，酷儿理论已经远远不够解释我们的现实存在了。

再有一个，我们每个人生活在具体的情境之中，“出柜”也好，不“出柜”也好，在理论上进行争论，意义不大。对小张来说，“出柜”可能是最好的，而对小李来说，“出柜”可能就不好。你干吗非要给大家制定出一个规律来呢？说同性恋者该不该“出柜”？大概世界上没有这么样一个规律，因为人们都是生存在不同的情境中。在今天这个会议上，可能有一些“同志”是刚刚公开了这个身份的，明天你到人民大学去，你到我的课堂上，你可能还会公布，可是你对你的父母什么时候公布？对别人怎么公布？

我个人觉得，妇女运动也好，同性恋解放运动也好，最终目标不应该局限在身份或者权利上，这实际上是很容易做到的，西方妇女做到了，西方同性恋者也做到了，没用十年就做到了，而在于我们要参与整个社会的建构，参与情境的建构。我们要把单一的异性恋的情境，建构成一个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的具有同性恋色彩、至少承认同性恋存在、尊重同性恋存在，建构这样的情境，这大概能够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既解决了要“出柜”的需求，也解决了不想“出柜”的需求。

如果同性恋是标签的话，我们要建构的是在这个标签之下的所有人都能够各得其所。仅仅靠酷儿理论发端早期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是做不到的，它只能解放同性恋这个标签下的一部分人，没有办法来建构更广泛解放所有人的情境。

第三点，讲一点，童戈老师的研究，我基本上一点没有参与，更



说不上帮助。为什么？我也没有本事、没有条件参与和帮助。但是，我为什么特别感兴趣？就是他跟我研究的其实是同一类人，我研究的是小姐，他研究的是MB。都是一个共同的特征——“性”加上钱。

这个研究就有点麻烦了，如果是“性”加爱，好，万寿无疆，是最崇高、最伟大的。“性”什么也不加，那是生物动作，跟禽兽差不多，比较贬低。而“性”一加上钱，完了，毫无人格，不但异性恋者仇恨小姐，一部分同性恋者大概也非常看不起MB。为什么？就是因为“性”里面加了钱了。这就是我和童老师进行研究的相同之处。我为童老师这个调查报告写的序言就是，这恰恰说明了，不论是小姐还是MB，他们只是普通人。有些妇女运动批评我说，你这样就掩盖了他们的悲惨地位。刚才还有代表这样说。不过，小姐们都是处于悲惨地位吗？我访问的好多小姐，都比我舒服多了。不能够那样看问题，什么东西都是整齐划一的，过去小姐都是妖魔，现在小姐都变成天使，现在世界上没有这个事情吧？所以我和童戈在这一点上相同。

也就是说，以往大多数研究的视角是在社会性别的视角下讨论同性恋问题，必然讨论身份认同、地位认同，没错，一点不否认它，但是我个人觉得，童戈先生的研究是从“性”的视角，在“性”的框架下进行的研究，所以，你从他的研究中会发现，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大家遭遇的问题大概差不多。大家可能也知道，我在公开场合从来主张支持同性恋运动，虽然我个人从来没有参与过这类事情。很简单的道理，就这一点，从“性”的角度来说，肛交，只有男人跟男人肛交吗？男人和女人不肛交吗？肛交有什么可稀奇的呢？它能够成为排斥一些人的理由呢？从“性”的视角来看，小姐不但跟MB一样，同性恋和异性恋的相通，也在“性”上，只是对象不同，只是方式不同，但在“性”的体验和感受上，难道不一样吗？“性”可以调动身体中的一切激情，也可以调动我们内心的一切仇恨，难道不是这样吗？同性恋者有MB，异性恋者里没有小姐吗？同性恋里有人仇恨、有人诈骗，异性恋里就没有吗？这样看问题，或者看世界，至少对同性恋运动来说，会争取到更多的同盟者。

任何一个世界，不管是我们的世界还是他们的世界，不在于参加的人数多少，而在于不反对的人数有多少。我个人判断，中国同性恋不管是什么去向的运动，大概用不了十年就会获得比西方更大的结果。就是因为在中国真正反对同性恋的人非常少。而在西方，有强大的教会力量，这个教会力量是很难阻止的。

所以，同性恋的运动也好、思潮也好，都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不一定说服任何一个异性恋者，但是我们要争取不反对。这是我个人一生中生存策略有点不同的地方，我更加强调争取别人不要反对。

不能说是总结，只是我个人提出的一些想法，都是假设性的，没有得到验证。尽管我们做非常实际工作的同志，不见得要去从事学术活动，但是，你可以想这个事，咱们可以谈这个事，咱们可以讨论、可以说。艾滋病运动给性研究带来的最大的危害就是把我们的优秀力量全都拉在项目里面去了，一头扎在项目里面，每天在发传单、发安全套，结果学院派被一举摧毁。刚才高教授说我们的教育体制把真正的学院派给摧跨了，现在艾滋病又把我们的学院派再次摧跨了，大家都去做项目，领上10万块钱，忙上三年，自己弄完也完了。

谢谢各位，最后祝纪安德和童戈先生以及在座各位在自己的奋斗目标上，都获得更多的成就，更大的成功。

郭雅琦：潘老师的这些话，对我们今后的发展方向，还有研究工作的思路，都是很及时的指导。从我个人的角度讲，我休息的时候还和高老师在谈，随着纪安德的发展，其实我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过去完全是靠兴趣，做的规模比较小，知道的人也不多，虽然也有压力，但是压力是不同的，现在随着我们的一些成果的出现，可能会带来很多人对我们期望值的升高，作为我来讲，压力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想通过各种方式能够呼吁有更多的人，请更多的专家在我们的今后工作当中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能够形成一个支持我们的专家网络。

最后，我还要感谢童戈先生这么多年对我们的支持，也感谢郭晓飞这么多年对我们的支持。同时也感谢所有支持过我们的机构组织和个人。

谢谢大家。

《分享与交流》

是非真品

欢迎索取

欢迎赞助

感谢福特基金会对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的支持

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

Beijing Gender Health Education Institute (BGHEI)

电话 (tel): 010—88517980 传真 (fax): 010—68470251

E-mail: bghei@yahoo.com.cn

通讯地址: 北京 100081 信箱 51 分箱 (100081)

Mail address: Mail Box 100081, No.51, Beijing China (100081)